

關於
胡適之與顧頡剛

的礫之二



MG

K825.4=72

12

的礫之二

關於胡適之與顧頡剛

定生編



3 2173 9292 1

目次

題外論批評態度·····	定生(1)
又來「罵」胡適之先生·····	定生(9)
顧胡適之先生勿懺悔·····	定生(25)
書猷子篇寄定生北平·····	陳槃(47)
再寫在槃的文後·····	定生(77)
顧頡剛先生的懷疑精神·····	何之(90)
爲「懷疑精神」等等質何之·····	陳槃(107)
我對於國學的見解·····	趙簡子(117)
說幾句·····	何子恒(140)
「新」「舊」材料與治學方法問題·····	定生(145)

題外論批評態度

就將一般意識所常接觸的術語來做話柄，我說，批評作品是需要「罵人」的。人到底是人，決不是 Mummy。批評人家的作品，而只 Mummified 樣寫下「寫完事終是死」氣沉沉，離人生太遠。批評是「活」人所有事，而是同類意識的活動。人是活則有血，有血則有同情或痛恨，有同情或痛恨則批評，故需要罵。

但是罵的屬性是各樣的，一是咀咒 curse，一是深諷 satire。兩者都帶要，而有重要的異用。我們批評一種作品，是需要持這兩種態的。第一種我們有根據理性負責地採擇之必要。

我們可以說，該痛恨的作品，我們取斷然嚴正的態度而用咀咒的方式，對的像美壇上的棍徒，翻譯界無恥的破落戶的空統照，離現代評論上胡適氏等這

他創造社的洪水罵過他，我至今仍覺得他們給這姓王的仍太便宜了。文人是最對的一重人格的（所謂兩重人格是客觀的事實，這話的講法，若從主觀的觀點上講，我們仍主張是一重。因為真正的文人始終是以自己良心所保證得到的全部生命來走他的人生之路；換句話說，他是不會更有一絲毫過剩的生命來預備打算他臨時此地以外的什麼生活的可能的。所以他忽而有形成他的兩重人格的事實發生，在良心上，在他全部的生命上，他不能負責。）文章是文人的生命表現，故文章與人格相表裏。這姓王的對於文壇上明是濫詐的行爲，此已無異於替其人格之破產，則其文章也便是沒有他的真生命存在（倘若他能表現其破產的人格于他的文章上，我們還可以認其有他的破產人格之真，而選他以相當的價值。現在不然，他的作品，是他的假惺惺的索詐手段，故不是他的生命之真。）

麼？我們敬重之，是就其「人」與「文」之人格而寫之。他專劣到極點，他好心地敷衍他未經，他是想要在文藝界騙取個中英文學實通的帽子。這是很清楚有證據的，就是他壓根兒不懂英文！一個人懂英文而想做個英文學家，這不但可充分證據，而且並不過分；其道理正像你會寫中國文章，你就有十三分的理由希望你做個中國文學家。現在這姓王的既不識英文，却想翻譯英文，也好，這絕倫的荒謬，倘使是去在「無人國」做皇帝，還荒謬的可以，可恨，甚至還自知其「騙子」的衣裳！——中文創作穿得上了，就想作進一步的索賄！只可憐，這座「假」座，決不會碧眼黃髮！要是他幸而是個「Jerk」時，不是竟敢冒充個美國才子麼？所以，我說，對這種人立的東西之作品，其批評態度，需要阻呢的方式。

真美，就是我所講演講（*Public Speaking*）的方式了。演講的方式，是著者最著情而

態度是熱烈的誠懇的。我們對於某篇作品，認其有批評的必要，而又不達到該阻
阻的程度，於是我們以熱情的出發點，作我們的文字的虛。我們也不妨有時
諷刺，有時候責備，乃至於近于損及作者的尊貴位置（此沒有避免的可能，因為
他的作品會有他陷于失墮的事實），但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另種的「幽默」，
絕不是可同阻阻併為一談。所以最近春朝上張友松批評徐志摩的態度實在
是會過火。徐志摩畢竟是懂英文。他譯曼殊斐兒的東西，我們沒有懷疑到他想要
若王統照的索詐一樣意思的理由，則是徐志摩仍有他在着的整個的人格。他既
有他整個的人格，則我們對於他翻譯的失錯，最多是深諷，而覺得非採取始終的
責備不可時則始終責備他也可以。是的，我雖自知英文淺陋，然徐氏所譯如康莊
新集，我也會頗深驚訝，以為徐氏不該如此粗疎，所以我也甚同意于張氏。徐志摩

的文就火氣的成分太多了，簡直像是我所認爲該去用在王統照的譯作上般的。況且張氏實在也有些地方甚可斟酌（我因爲這事去買春潮裏本來看看，後來給一位朋友拿去，所以現在無從舉出討論）何以第二次答胡適之倒越起三千丈無明之火？胡氏用函信去給梁實秋的態度固然並不光明——顯然是不屑同小孩子們爭鬧氣似的而又要批駁人家——然這一點似乎不是就是可咀咒的理由。最少在批評譯作工作的意義上，讓你怎樣牽扯，總不能牽扯到需要像張氏那樣阻礙。胡氏的說張氏「宰人」這不能說是擺架子之類，這是不會冤枉張氏的。張氏似乎該盡心一些。現在憑記憶所得，「年青」二字，張氏自不習慣用，而總以爲罵徐氏之貴，這便有點太自足了。

我們看張氏的批評態度，知道張氏是過于熱烈。熱烈而過于，其結果會失之

鬧意氣。試問批評的本旨是不是在鬧意氣！我們知道，「罵」之不得不，可以說是批評的一種手段。站在活人的立點上，是同情是痛恨都是以同類意識為根據，即是我前文說過的所以無論如何採用罵的方式，我們也要在理性上估量過其適當的步驟。我們不是取快一剎那。取快一剎那，則批評的價值也太小了。要不然批評的價值決不會如此小，則態度不適當的批評我們不能承認其為批評道理就很顯然。

所以我現在可取出對付人家的作品的四種態度來說。

1. 咀呪 (Curse (甲))
2. 深諷 (Satire)
3. 咀呪 (乙)
4. 冷語冰人 (Cynic)

附注：

這裏所譯的術語都是約取意思，不敢說是確譯。

1 2 兩種，我認爲是批評的；3 是不該用的，1 故成爲與 4 一樣的不是批評的。用中國成語講，3 是太過，而 4 則不及。4 爲什麼不是批評，因爲不適用於人類的同類意識。它的動機，不是同情與痛恨（也是同情之一面）而是嫉忌。這決不是羣的德性之一。這一點，我可以舉一個類似的具體例子。第六十二期的語絲上劉復氏罵瞎了眼的文學史家那篇文和後面好管閒事同林語堂等二篇，及六十四期的奉答陳通伯先生答答 S S 君及某前輩一篇，這樣的文字態度，假使用來批評人家的作品時，我們也可以承認其不是批評，因爲這就是鬧閒氣的冷語。

關於批評的態度，我的見解是如此。我這會子的「罵」適之先生，當然就是我所讚賞的。我敢以我的良心擔保，我是顯能履行我的從同類意識。

的根。據。上。由。熱。血。出。發。而。以。誠。懇。的。態。度。表。現。之。的。我。所。謂。『。幽。默。』。的。

倘若我這句話不爲適之先生或旁人所相信時，則我只能承認我的文章的寫法失敗了。

定生在半夜裏想着，天亮寫出來，七月廿九日。

附說：「罵人」已成爲熟語，故我以「罵人」爲這文討論的目標。又適之先生嘗說我的文在「罵」他，所以就發用「罵」字了。

在北平。

又來「罵」胡適之先生

我真是想了六個月，仍想不出這道理！何以在邏輯（Logic）上胡適之先生會寫得出這樣的文章，而編小說月報的出名編出文學史的鄭振鐸先生，中山大學的「預備」研語言歷史學的學生陳槃先生會相信這樣不合邏輯的文章——治學動方法與材料！這真是氣死人，氣到死去仍是剩顆欲哭的酸酸的心，剩一對欲哭的大大的眼！

我到上海，就去見適之先生，我是從娘胎帶來就永久是鐵的，我愛上適之先生了。我愛他那握手，愛他那玩笑——龜鏡「你寫信來罵我」——愛他那不知是什麼的可愛，愛他那叫

我乾捲煙，——他說，「要做這種工作，到不可不學會」我仍是綿羊地笑辭了——愛他那叫我常常來玩。我在馮沅君先生家數坐了足足三個鐘頭的顯嚴閉的心，開放了，到適之先生的家面開放爲一朵很大很大的愛什麼的花了。真的，我看適之先生像我們的伴侶。

然而，然而！我固然愛適之先生，我遠聽他辯藥價秋（？）先生說我以邏輯駁他是不對，邏輯簡直該廢掉（不是他說，是對方說）而我又是綿羊地笑，領是然而，我是給我的瘦弱支配了，我不忍——會同他當真討論我承他勉勵了多少話，我歡喜我「義形于色」（這里不知我何故要用這個不切題的

虛話，但總覺非如此用不可（沒法也）的。我心在癢，在癢，在癢；我同顏剛先生在歸途的電車上，我真如鄉下人之受皇帝之恩寵；然而蒙蔽始末終地承認適之先生那文的形式上對根本錯誤！然以文章有文章的色彩，思想有思想的形式。適之先生那篇文，思想的形式錯了，所以文章的形式錯了。文章的形式是在代現出思想的形式。

假使適之先生不寫下那文，適之先生就用『靈龜傳』（仍是假使的話）將現代的中國語言歷史學的『天靈蓋』一擲然！刺個不知方向，迸散迸散！我依然快活，依然歡呼，我說：『我們的適之先生是多勇敢呀！他又站去時代前首了！』假使適之先生不

寫下那文，適之先生慨然而叫曰：『提倡自然科學！研究自然科學！大家向前！除自然科學，我們看它做「矢楛」！我們丟去紙上的「矢楛」呀，好孩子！』我若是孩子，我假使是能够，即是他有話，我一躍挽了適之先生的臂膊，我說：先生呀，我愛你！

不然！天哪！

不然，我們的適之先生不然！他偏要寫文章，而寫出那樣料我永久想不通的文章！

我決是莫明其妙！怎麼這樣矛盾的文章會可能寫！適之先生呀！我愛先生；我尤愛真理。我雖是秋蟲不足以語冰，然而秋蟲該可以語秋。先生呀，是秋呀，決不會秋蟲該去說夏呀！

適之先生的文，其所以叫我這樣跳限之故，是其文之統一性。厥根兒不能成立。要是讓步的話，文是絕不發生絲毫聯絡的。由幾段短文章的雜湊，可以取來像蔡邕之用論衡章句「贊讀改」不決不決不能承認爲是適之先生在做文，在講話！

適之先生之大錯處，是在將紙上材料與自然界混爲一談！紙上材料是一事，自然界是一事，這其間各有各的極止。紙上材料（注意！是材料）那怕你「七十二變」自滿地想開頭末日審判仍是紙上材料，則其弄出來的成績是紙上成績。自然材料會造成物質文明，是自然材料特個性。這明白清楚，適之先生也是相信的了。如之何，禍從天降，適之先生忽又拉攏方法。

夫材料之分紙上與自然界，假定可以這樣比喻，其不能互換，猶男之不能變女，女之不能變男也。那怕廣告上之吹牛如

「生稿靈」假若是真時，也只能叫男子的胸膛吃銀盒，將面積起若女性，其多餘之某部肉，決不會忽然而竄。此理理明。故「機是吃飯，一樣是運動，如之何倏忽發一論曰：『假若男欲成女，則多吃女人之飯，運女人之動；女欲成男，則多吃男人之飯，運男人之動。』（「運動」我如此分用，竟像郭沫若卷其集之釋「玄黃」了，本該打嘴巴）天下有此種說話，面會成立，請聽聽！！

今適之先生之論是怎樣者！適之先生曰：

「然而材料限死了科學的方法」

何以故？

『方法雖是科學的，材料始終是文字的。』

于此，我們得而推論曰：方法用至甲則爲甲，方法用至乙則爲乙，所謂之限。死。此易證明。倘若方法用至乙而仍是甲，用至甲而仍是乙，則甲乙之與方法，不發生特殊關係。換言之，方法則方法而已矣，于甲乙乎何與！

好好，我們看得清這話的鈎連。即如前喻，飯吃至胃大肚裏去，發出的營養料，會去造精液；飯吃入女人的肚裏去，化爲營養料，會去造女人的卵珠。同一吃飯也，或爲卵珠焉，或爲精蟲焉，皆其特殊關係（甲乙）限之也。

然而適之先生決不讓我們看清這鈎連。他要另起第五度的空間。他引了許多西洋人自然科學的成績來比較中國的紙正成績。這已是裸一女人而對男人曰：『你看那她一身的肉，這樣均勻，她的曲線這樣優美，尤其是她這不打斷周身和諧的節奏的她小腹之下！你你，醜男子，不說旁的，你那闖入者就叫人欲嘔！你雖吃飯，你不能如此優美，多可羞啊！』一樣好幾了，裏面也只是以女美驕男人，乃天哪，適之先生的不顧士林處，豈不在此！他舉例人不會化女！於是希望去遊女國，歸來教死飯裏會化男人也！

他稱讚西洋之科學方法皆用于物質，不用于紙上，所以有

好成績；那末對於內國，也便應該提倡用方法于物質，勿用紙上；換言之，就是根本上屏棄紙上，才是道理。他不說：

『西洋學者先從自然科學下手……然後用他們的餘力，回來整理文字的材料科學方法用慣了，實驗習慣養成了，所以他們的餘力便可以驚人的成績。』

『先從』的是什麼科學方法！『然後』用的是什麼科學方法！『用慣』了的什麼科學方法！『養成』習慣的是什麼科學方法！朋友，你們記住呀，就是說翻個太陽做月亮，也是科學方法呀！夫這樣，到底講個科學方法罷了，同東西洋（甲乙）的空間從何顯出其絕對的差異的意義來！西洋用科學方法，所用

自然界，則成績爲物質文明；東洋而用科學方法，所用也是在自然界，則也成其爲物質文明。反之，東洋用科學方法，倘只用于紙上材料，則成其爲東洋學問之成績；西洋用科學方法，倘若也只用之于紙上材料，則也必成其爲東洋學問般的成績。夫此，夫此，非理之至明至明者乎！適之先生一若以爲既有『餘力』（用餘力二字，已非科學至極！）便可顯其不是餘力的全力之類的科學方法就忽而會叫紙上材料化身也者，曰：

『等你在科學試驗室裏有了好成績，然後拿出你們的餘力，回來整理我們的國故，那時候，一拳打倒顧亭林，兩腳踢翻錢竹汀，有何難哉！』

天呀！這真是鼓舌如簧，說『朝三暮四』試問，『在實驗室裏有了好成績』與『回來整理國故』何關！在實驗室裏有了好成績，最多不過是爲其科學方法『用慣』了保證而已，同整理國故何關！『國故』不終古如斯的依○然○紙○上○材○料○的○故○我○難○道『實驗室』同『用慣』等會保證到紙○上○材○料○忽○然○而○像○自○然○界○似○的○可○以○造○成○物○質○文○明○的○果○是○科○學○方○法○只○能○問○方○法○則在國內也可以打倒顧亭林，且並不必于實驗室有成績。用納如不是科學方法，顧亭林決無打倒之日！顧亭林之會被打倒，正該坐不用科學方法之故。

嗟乎適之先生！你若謂中國治學不能用科學方法，所以須

提倡科學方法；你決不該以紙上材料之故而輕視中國用科學方法的學術！你若謂中國沒有物質文明，所以須提倡研究自然界；你不該又忽而拉攏紙上材料來！我相信，我相信中國目下該提倡自然科學。然而用科學方法的非自然科學之紙上材料，牠該有牠自身的絕對值在，我們不該侮辱牠！（說牠用不嘗以實驗室裏弄得有成績然後以其餘力來從事的科學方法就沒有價值；在實驗室有了成績然後以其餘力來從事的科學方法才有價值，這不特是侮辱紙上材料，並且侮辱科學方法。我至此不免要再比喻了。譬如趙元任先生因爲是在美國的實驗室研究過語音學，所以他以其餘力來教人發國音字母的音就有價值。

倘若趙元任先生所教的學生，因為是沒有進過美國的語音實驗室，他所發的音就雖同元任先生一樣正確，但就沒有價值。這話會有道理也無呢，(老天！)我們所提的紙上材料與自然科學的話，只有態度之一問題。我們需要自然科學乎？我們要仍事紙上學乎？從此兩者中擇其一而『固執』之，此之謂態度。此絕然與紙上成績如此，自然成績如彼無關。我們決然捨去紙上學，不談，初並沒有絲毫減少及于紙上學間自有的尊嚴，因為我們是持此態度。我們決然而欲研紙上材料，也于紙上材料的自身之尊嚴無增。紙上材料便是紙上材料，以科學方法對之，仍是紙上材料。實驗室，習慣，養成，餘力，決不能改變之也。適之先生主張

材料限死方法的，然則又主張方法再生材料乎？方法會叫紙上材料立地化成輕二養乎？方法會叫紙上材料立地成蘋果墜地乎？方法會叫紙上材料給瓦特造水蒸氣乎？方法會叫紙上材料給恩斯坦發明相對論乎？嗟乎，此真大惑而不可解焉者也！夫適之先生須知，你所謂方法是同一之方法也。同一之方法，既因爲人限死而異，已奇；又因有經過某種養成而又會生活（外動詞）人家的死的紙上材料，此不是第五度的空間乎？實在，只有適之先生發明第五度的空間時，在三度乃至四度空間中的邏輯的矛盾又矛盾律，不會領會如此相對的思考也。

算了，我不必再討論旁的問題了。中國人的意識是沒有

科學訓練的，倒不錯。好像我如此說，槃弟就會當我是欲以「語言歷史學與自然科學分庭抗禮」，這真只好笑他太像適之先生了，又不會看清楚我的文了。也許，是我太壞，文章寫得不好，不叫聰明的槃弟看得清楚，我還要說甚麼呢？

文不過想將它同簡子，槃弟等幾篇合爲集子入的碟；不想接槃弟又加入討論一文，一時心湧，餓一餐，以這餓的工夫傾出此篇來，真若腕若有神。我該謝槃弟呢，還是要他賠我這一餐呢？

我將這篇當這小集子的序文了。

一九二九，七，十六，定生在北平。

適之先生的矛盾又矛盾的論調大綱

1 承認「漢學家」是科學方法，
.....
「矛」

2 不承認其會有「好成績」
.....
「矛」

3 承認進過西洋實驗室（畢竟仍）是科學方法，
.....
「盾」

4 承認其會有「好成績」.....
.....
「盾」

適之先生知此矛盾，故創「限死」之說，然更矛盾：

5 方法給紙上材料限死，
.....
「矛」

6 故沒有「好成績」.....
.....
「矛」

7 從西洋實驗室回來後的方法仍給紙上材料限死，
.....
「盾」

8 但就有「好成績」（打願踢錢）.....
.....
「盾」

顧胡適之先生勿「懺悔」

何定生

新月一卷九號上發表胡適之先生治學的方法與材料一文以後，因為這是胡先生最近的態度，所以現代青年的編輯何子恆先生便寫了因胡適的治學方法與材料問到西洋科學發達的背景一文來，再加推論。我是因為何先生的文才去找胡先生的文來讀的。我讀了胡先生文後，我居然一個整天在彷徨苦悶中！我茫茫然去趁東山的車，恰好遇着何先生。在車裏，何先生第一句開口的話是「胡適之的態度又變了。」『是的，你的文和胡先生的我都看過了，』我說。『胡先生是當今學術界的權威，他的態度是會給予人家以大影響的，』他申說一句。『我很注

意胡先生這文，我接。于是何先生說：『你如有意見，請你給現代青年發表罷。』往下他又補上一句說：『我也並不反對國學整理。』我們的談話是要接下去的，可是汽車恰於這時到大學站了，我只得帶他的這些話下車。

不錯，我是有必須寫出來的『意見』的，對於胡作。何先生說他並不反對國學整理，這話也是實在。何先生的文，驟然看好像是胡作的同調的反應，其實見解就已不同於胡先生，這從『不客氣說一句，中國三百年來的治學態度，是中世紀非科學的態度』和『英國數理哲學家懷德海與社會學家霍布斯說中國人沒有做到爲學問而學問的地步，沒有達到產生抽象

科學的階級」二語而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全部的意思是集中於謂中國的治學說不上科學方法這一點，而不是對於國學整理作根本的攻擊之矢。在這樣場合上，我和何先生的意思，可算幾乎是一致。故我欲說的話，是對於胡先生的文而發。不過，何先生也有一處，似乎和我的觀察不同。他以梁啓超、胡適之和顧頡剛相提並論，這分明是對於新近治國學的新方向——非三百年來的樸學所能够會有的——不嘗加以認清。換句話說，他幾乎是以爲今日所有的治國學者，仍是梁任公式的治國學，至多道仍是三百年來的樸學，仍是中世紀非科學的治學，這是太籠統的觀察了。其實給國學而像顧頡剛所持的方法和態度，已有

更達於科學的之傾向。這話在下文講。現在且認清適之先生的態度再說。

適之先生這兩三年來的心，好像很苦。民十三在努力週報的時代，他還是在努力，到後來便不然。不知是因為受不了一般人的罵了不是，一九二六年，便早已有改變態度的傾向。他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第四次的懇親會上，便已有這樣的說話：

『說到整理國故……因為這事我大約總得負點責任，所以不得不懺悔……』

『懺悔！適之先生不是在說治學，是在懺悔。所以他一劃

曰：『國學是條死路，』再則曰『國學所包的是所謂經學，文學，哲學，都是死路，』終于結以『我希望青年能更去走生路去，儘量離開這條死路的好』的幾句決然的話。看了這些話，我們再讀他這今日的治學的方法與材料一文，於是我們知道，他不是站在治學的立點上說話，總是依然站在『責任』上『懺悔』說：

那一九二六年的懇親會演說，因為還是三年前，所以他還說：

『整理國故，是重在「整理」兩個字。「國故」是過去的文物，是歷史，是文化史；「整理」是用無成見的態度，精密的科學方法，去尋求那已往的文化變遷沿革的條理線索，去組成全

部或局部的中國文化史。不論「國粹」「國糟」都是「國故」。我們不存什麼「衛道」的態度，也不想從國故裏求得什麼天經地義來供我們安身立命。」

到現在，不但沒有努力週報時代的『力』，連一九二六年北大國學門懇親會上的也沒有。於是適之先生治學的方針與材料之篇遂爲一九二八年的態度。

本來，態度的改變，真的像何先生所說，是「試驗精神的好處」，我們本不能下什麼轉語。可是適之先生分明是學術界的權威，他怕貽誤青年，他便懺悔；這種懺悔，其關係比他的恐怕貽誤還要重大，萬一不慎，懺悔反成真的貽誤，那才可憐呢！

我何以要這樣說？我讀治學的方法與材料而後，我覺得適之先生已在開倒車。適之先生何以會致到開倒車，他在那篇文中不是正正是怕人開倒車？適之先生是時代的人物，是三百年的樸學過去以後的人物，最少該不反到三百年的樸學上去才對。在進化的時代中，不能跟著進化，已是開倒車，說了三百年，不能更進一步，從三百年的樸學的竿頭，踏上二十世紀來，這不是開倒車？最可憐的是他的態度既不光明因不得不說模稜語。我愛青年，我愛適之先生，我於是不得不冒昧來分

析適之先生的文，讓大家不致誤會先生的意思。

整理國學這個問題，本來是很繁複難講的。國學要怎樣整

理？整理了有什麼用？就這簡簡單單的兩個問題來講，便可以打了一場筆墨官司。爲什麼？因爲後一個是價值問題，前一個是方法問題。提及價值，便要發生大的岔路了。從方法上講，實在以純粹的抽象科學論，以『爲學問而學問』的純粹科學精神論，價值說是不能存在的。要是真是求『知』，求『真相』，求『真理』，正正當當，不許問及價值。論價值，並不是學問。故學問是和價值不相容的。這個道理，甚爲明顯。你看西洋的學問，深入淺出，是如何有條理而細密，什麼事物都能弄個系統出來，清清楚楚。中國的是渾沌一團，而且非「經世大道」不講，否則細民之流！

這兒，一定有人要駁我說，『西洋文化倒是在實利上發達

了，並不見得就是純粹的學問。」這是很容易使人誤解的。所以我常常說，持實利（即價值，對於人生的價值）主義者實在太淺薄。學問不能離實有世界（人生之謂）而存在，即一切學問自身便有實利在，根本上無標揭什麼實利之必要。標揭實利，則一切通常不能驟然發見的，皆被攪棄，其所成就，不是太狹！哥白尼不去從種田，織布，營商業著想，偏偏去研究那大家目爲狂妄的什麼地又會動，又是圓的的天文學，這真是有什麼用，在常論上看來？牛頓看見蘋果墜地，瓦特看見水汽掀動鍋蓋，便要去冥想，這不是常見上的所謂傻子故治學問，我們把定了方法了，向學問深深鑽進去，並沒有覺得什麼用懸在目前，這却往往是真

的，大的實利所在。所以，我們也可以說，實利這件事物並不是虛中的功効，而是意外的辭報。

我的話扯得太遠了。現在回來說國學。國學是一部爛塗帳，這不消說，以故需要整理。以真的科學方法講，我們便誠如適之先生所說的『不管國粹國糟』本來不應加以價值評判。但是，適之先生居然加以『死路』的判案了，而且是自翻其治國學『要從生路上走起』的說話（懇親會上演說）何以覺得，他在治學的方法與材料一文上根本便不承認生死之說是不在方法。他說：

『同樣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材料上，成績也就不同。』

『顧氏閣氏的材料全是文字的，葛利略一班人的材料完全是實物的。』

『文字的材料是死的。』

我們看，適之先生是將西洋的治學來和中國的治學比較的，他譯西洋三百年來的學是會有『驚人的成績』的，而我國則只是『枉勞心思的開倒車。』依他的話，我們可排成下面的詭譎形式：

1 關於材料的

『文字的材料是死的，』

『顧氏閣氏的材料全是文字的，』

故顧氏闔氏的材料全是死的。

好，材料有生有死，同樣的方法該前後一致呀！他不這樣承認。他由『生路是一切科學，尤其是科學的方法』一變而為方法也可以跟材料而死。他說：

2 關於方法的

『顧炎武闔若瓌的方法和葛利略牛頓的方法是一樣的，』

可惜『顧氏闔氏的材料全是死的』

故顧氏等的方法也死了。

這種論理，我頗懷疑。分明是在材料自身，何以『方法』會

有兩樣屬性？然則是沒有科學的方法，以實物爲對象，也可以產生所謂『生』的學問了？然則科學的地位不是根本動搖了？方法會跟材料而生死，復何貴乎科學方法？尙且，先生一九二六年懇親會所講，明明說『這條死路要從生路跑起』，又說，『生路就是一切科學，尤其是科學的方法』。那時的『國學』不是依然目今所說的國學，不是依然『死材料』的『文字』？何以那時的生路，的科學方法，便不會跟同一樣死材料而死呢？這不是前後的論理矛盾了？照這樣看來，承認方法是生的，即不能說闔若輩等的方法是死，可如下式：

的，

「顧炎武闖若環的方法，和葛利略牛頓的方法是一樣的，

葛利略等方法是生的，

故闖若環等的也是生的。

但，適之先生既根本推翻其科學方法是生路之說，也只好我們看其方法跟材料俱死的話是否真確。我們知道，要是方法的跟材料而生死，則凡做得有效的方法，一定是生的。而功效在未可知時，便也無所謂生的方法。但我們看下面的話。

(1) 『科學的方法是用慣了……所以他們的餘力，便可以有驚人的成績。』

『……方法用慣了，……便可以……』

這又已是承認方法是在見功效（成績）前可以看出生死來了，爾前面方法跟材料而生死又矛盾。

（2）『等你們在科學試驗室裏有了好成績，然後拿你們的餘力，回來整理我們的國故，那時候，一拳打倒顧亭林，兩腳踢翻錢竹汀。』

在『試驗室裏有了成績』固然可以見得方法是『生』的；但『回來整理』的仍是『死』材料的『國故』方法是跟材料而生死，何以能够『一拳打倒顧亭林，兩腳踢翻錢竹汀』呢？趙之先生爲甚麼會前後論理這樣矛盾得厲害呢？一九二

六的態度和一九二八年的矛盾，這還可以講得過去；同在一文中，而也有這樣的矛盾，這到底是什麼緣故呢？我們對這種現象，只有兩樣說法可以解釋：

A是，把『方法』與『成績』混爲一談。

B是，要提倡前清的『時務』式的學問，而又不願意負這種責任，因而成這樣模稜之文。

我斷不敢這樣的太冤枉適之先生，說他忽然思考不清楚了，將入實驗室去的意義看爲不只在方法而還要做具體的東西出來。譬如，進化學室去分解水的原素，將養氣和輕氣全都分裝於玻璃裏，以化學方法論，斷不是在叫你去造養氣或輕氣，而

是在要你明白怎樣分解。養氣和輕氣之竟給你分解出來，這是『成績』，即叫『功效』，但你會分解了，這種意義和功效有什麼相干！故我想，對於A項，適之先生必不至此。然則B項麼？適之先生居然真要開倒車麼？要是適之先生沒有開倒車的動機，只是太想『懺悔』，那末，我的適之先生，請你當心一點，須爲你前此轟轟烈烈的光榮的『力』深思一下！

本來，適之先生所說『三百年來最高的成績，終不過幾部古書的整理，於人生有何益處？於國家治亂安危有何裨補？』幾句話，是會叫人聽了心痛的！永久站在『人生』立場上，永久站在『國家治亂安危』的立場上的我們的孔聖，到底他的學問也

便何補當時數千年來文化不發達的原因，便正是坐永久埋葬在太淺薄的功利之故——修齊治平，不正是這『神明華胄』的『金科玉律』好，也罷，這是過去的。但中國三百年來的治國學的方法，分明未到家，這一點，適之先生也該見到的。他却說他們的方法完全和牛頓等一樣。(甲)

承認他們的方法和牛頓等的是一樣了，他又承認這一九二八年時代的中國國學的方法，最多也便是像閻若璩等的了，而又從兩斷之曰，此是死路。(注意，這已自作翻案，居然也無異斷牛頓等的方法也是死路！)(乙)

從(甲)點看來，適之先生是太疎忽了；就(乙)點看來，

則是思想退化。國學的整理，用嚴密的，深沉的，冷靜的，細心的科學方法下手，在今日正是新的徹底的大運動的時期。換句說，正是中國傳統思想的革命運動的開始。今適之先生乃以一己的『懺悔』寫成模稜的文字，倒持『太阿』，授舊勢力以柄，這豈不是在開倒車！以適之先生的文，前後歸納出來，該非根本上不認國學有整理的理由不可。國學既不是水，便不能給瓦特從瓦特發明汽機，也不是電，便不能給雷蘭克林發見，因而給愛狄生拿來造成這個奇詭的電世紀。這真要怎末辦！且文字都死，國學怎樣化成其它的實物，好成爲自然科學的對象，像適之先生心目中所判定的。

實在，清代的漢學家是不能認為真的科學方法的。其原故，傅是適之先生所說過，便是不會「創造平常不可見的懷疑」，不能夠「根據假設的理論，造出種種條件，把證據逼出來」，「以說他傳的方法和牛頓，高利略的一樣是不對的，是本重證據學家，因漢學家的成績而優獎到科學方法，致到有開倒車的危險，那是太懸竊學問了！讀譚剛不是這一本古史辨，便講倒了許多大人君子，聖人之從變！傳統思想且因為他的費其獻，羅振，駱，諸，蔣不是復光榮的一道新的亮光，不是很威猛的一種新力量。適之先生說方法跟材料而死，這何嘗會死！適之先生證於人生有什麼利益，這不是於思想上開了新紀元！論方，這

不是由於會用「假設」會「創造」證據？閣若璩等何嘗有此！
這又何嘗會依然同閣若璩等一樣！

固然，我也是絕對不主張青年人都去跑國學之路，而且我自家便是不配跑此。但，我也絕對不相信路的忽死忽活，在同一用科學方法！我相信今日的中國必向自然科學方面發展，但我決不相信淺薄的功利主義會益於治亂安危！張之洞劉坤一乃至康有爲終久是過去的僵尸，我以為適之先生決不會致到自怕其影。適之先生儘管勸青年勿亂跑進去，但也蘇堪坦蕩蕩，勿聽模稜話！

是故，我這些話便是不得不功利點，我總以爲這個傳統底

想澈底大革命的工作，不該在適之先生的手上，顯出反動勢力來！

一九二九，一，十，上午，三時完稿，在廣州。

七，十五，在北平，略加修改。

又，現在的題目也是改過的。

書獃子篇寄定生北平

陳 槃

書獃子，文雅一點說就是『爲學問而學問。』

書獃子這種人，古已有之，于今爲烈。

古式的書獃子是『經世先王』的實際政治家兼經師而
對立的。現代的書獃子，是對於物質文明，狹隘的功利主義而成
立的。

古代所爲書獃子者，止會背誦詩書，開口合口聖經賢傳，書
本以外，天下大事，人情世故，一點不曉得的。我鄉有句笑話：

「秀才不會寫『牛稅耕』」。

就是說秀才止會做文章，稅牛耕田的契據就寫不出。這秀才就是書獃子之一種。

今代的書獃子比舊時的都算進步了，天下大事，人情世故都懂了，就是『牛稅耕』也會寫了。然而，止會在書本上發明道理，任管你的道理怎末高深了，『賢於古人』很遠很遠了，但是這與國計民生，何補于事？反而，自己還天天靠住『勞力者』生活着呢！因此，這種人仍然是書獃子。再不然就是傅孟真先生說的『書院學究』。

够得上有書獃子之資格者有文學家，哲學家，藝術家，語言歷史學家等等。此地所要討論的就是末后一派——語言歷史

學家，亦即所謂『國學家』。

二

語言歷史學家是書獃子，我說，但定生聽了是不服氣的。他的顧胡適之更進一步（見現代青年某期，現在手頭無有，未能徵引原文）是代表他對於語言歷史學的整個的態度。在那里，他止承認材料有新舊，沒有生死。換言之，他止着重在方法上面。他認為方法確有生死之分。假如方法是新的（所謂歸納以求通則演釋以用通則的科學精神），則紙上的事物，自然的材料，一樣可以造出所謂自然科學的貨色來；反之，如所用方法是死的，則儘管你研究的對象 *object* 是自然的物體，王明陽『格

「了『七天』『竹子』就害病；朱晦翁只能懸想原古時代水犯的情形，而不能成爲西洋最近發達的歷史地質學（何說大意如此。）

胡適之怎末說呢：

『同樣的材料，方法不同，成績也就不同。但，同樣的方法，在不同的材料上，成績也就有絕大的不同』（治學的方法

與材料，新月一卷九號）

又說：

『……從梅鷟的古文尙書攷異到顧頡剛的古史辨……

方法雖是科學的，材料却始終是文字的。科學的方法居然

能使故紙堆裏大放光明……三百年的光明也只不過掛
紙堆的火燄而已』（全上）

又說：

『我們的考證學的方法儘管精密，只因爲始終不接近實
物的材料，只因爲始終不曾走上實驗的大路上去，所以我
們的三百年最高的成績，終不過幾部古書的整理，於人生
有何益處？於國家治亂安危有何裨補？』（同上）

因此，何胡兩氏的主張根本是立于反對的地位。何氏只問方法，
不問材料。胡氏則謂方法要好，材料也要好。

我是『豫備學』語言歷史的。我對於胡氏的態度，另有不

能同意的地方，這在下面再說。止就材料與方法的問題而論，我個人覺得胡適之的理論講得很透闢，見到的也很清楚；而定生的道理，只講到一半。當定生的願胡適之更進一步發表后十多天光景，我有封信給傅孟真先生順便提及這事。及至最近，友人林超談及此問題，意見不謀而合。我對傅先生說：「胡適之想以狹隘的功利主義統一學術界，我不贊同。我固贊成科學（自然科學）救國的。然而，我反對凡不是實用科學範圍內的學術，統統取消。至于定生要替語言歷史學撐持門面，挪樸學家的科學方法，態度和成就追踪于牛頓，哥白尼，瓦特，這未免過火了。牛頓一般大研究的對象是自然界的東西，故當其學說未證實，試驗

未成功之時，差不多完全是書獃子。然而，到了地心定律等實科最後成功的一天，他就是世界科學發明家了。所以，研究學問以實物爲對象的書獃子，許是他們過渡時期的徽號。科學發明者，是他們最后的慰安和對於物質文明的貢獻。說到語言歷史學家如何呢？他們的成就便不同了。錢竹汀雖然曾經替我們發現了古無輕唇舌上之語音；王引之父子雖然曾經替我們解通了經傳中許多語詞；顧頡剛先生雖然曾經由一首歌謠的轉變，到「孟姜女研究」再歸納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史」的通則，錢適一條條上在語言歷史學方面，誠然是驚人的成就，可曾和亞特一樣做過多少子火車，輪船之類給世界人類享受過嗎？到

底他們是不是書獃子，對於國民生計一點子影響沒有！（大意如此）

現在這樣，正好像梁漱溟氏指出的東西文化中的兩條道路（這路子對否另一問題。胡適之批評它不對的。此處不具論。）西洋人開步走，印度系人向後轉，梁氏說這兩種生活態度是頂重要的問題。假如印度人是真向後轉的，就是與西洋文明背道而馳，兩下裡越走越距離越遠，假如印度人的生活還是向前，雖慢一點，漸漸還可以追上去的，就是說，在前進的路上，只有快慢之別，無根本的方向的不同。語言歷史學與自然學正好借用這個譬喻。就是，自然科學是前行的，語言歷史學是否也同自然

科學一起朝着物質文明的地點而走向前去呢？若說『是』，則畢陳第，王夫之，閻若璩，顧炎武的才力『趕不上』，發明望遠鏡，海濶利略，發明解析幾何的笛卡爾，發顯微生物的李文厚，發明微積分的牛頓，然，靠着他們自己和弟子們的努力，未嘗不可以慢慢追上去的，他們走一百步，我們未嘗不可以走上五十步，十步——若說『不是』的話，那就只好自己在故紙中發『火爐』，讓他人在由鋼鐵時期，到電氣化的時期了！

據個人的意思，則情形正屬於後者，胡適之因此勸我們青年轉條『生路』走走，定生要把語言歷史學與自然科學在物質文明的國度裡分庭抗禮，這『不虞之譽』，真有些令我們『預

「備學」語言歷史學的『受寵若驚』了！

一位現在還存在的法蘭西文學史家朗松，他的在比國的演講詞中，說了許多關於研究文學史應取的態度。他說：

「我們研究是屬於歷史的，我們的方法即是歷史的方法。將來我們的成績只是歷史的真確（科學精神與文學史的方法，鄧季宣譯，東方廿六卷四號）。

對了，研究自然科學的人和語言歷史學者因其對象不同，結果定完全兩樣。歷史語言學者所用的只是科學家給與的工具，你只說得上有科學的精神，却不能造出自然科學者的貨色。我們的定生如再不服氣，那也無妨用漢學家的方法，產生些穢

巧的傢伙給胡先生看，否則，就算定生的官兩，給胡適之打輸了。

三

大概反對語言歷史研究的人，正是用了一條狹隘的功利的眼光，看清楚這種種把戲是沒出息的，是不能發現的 *positives* 而偏偏自『胡適之進了國故之宮』後，『國學系鈞鑿鼓打得最響亮』他們最初是眼熱，不得已而義形于色了。

這的確是自然學與語言歷史學之爭的焦點，這兩的難處是歷史語言學的致命之傷，我們也無可諱言的。

然而，語言歷史學的根器僅僅是這樣無聊淺薄，不值一擊嗎？不然，不然，大大的不然。大凡一種學問，尤其是一種能維系人

類的精神，照耀人類光明的前途的如語言歷史學之學問，其所以能歷古不墜，日月常新的，自有其所藉以生長發榮之價值存。在這誰也不能否認的。

他的價值，籠統一點說來，是人類精神的食料，心靈的鼓勵。詳細一點說來，人類沒有歷史的記載，則社會文化從中間斷，祖先活動之成績，作業，不能廢續，如有機體的發展（語言文字學為探討故籍之工具，故此文以歷史與語言相提並論，合在此聲明）獸類猿猴就因為不會利用各種工具，沒有語言和複雜之歷史現象，故一萬年不會進步。

不過，在此地我們須得趕快聲明一句，就是，我們努力的結

果，雖然有這種上行所述的『精神』方面的『效用』，然而，我們不能預先便存着種念頭的：

『無偏頗的好奇心，嚴肅的信義，勤勞忍耐心，尊崇事實的精神，信仰的慎重，自信與信人，都要持疑難的態度，要有不斷的批評精神以及考察與校正』（同上科學精神與文學史的方法）

胡林對於整理文學史的見解如此。我們考古的人也應該有這種『尊崇事實的精神』和『不斷的批評精神』呀！

說到語言歷史學，它是『國學』的中心。而這所謂國學則包括政治學史，法律學史，經濟學史，社會教育，文學，哲學，藝術，宗教

歷史的總匯。這些古代學術史的材料，十之八九都是靠歷史語言學家負擔供給（與其說供給，毋寧說整理）；而這種材料，在古代是一塌糊塗，真偽混雜的；而且，有許多地下的直接史料，我們還不會有計劃的發掘過，整理過；所以，把紙上材料與地理事物參稽互驗，溝通證明，把假的貨色，洗滌清楚，新的東西，建築起來，語言歷史學家的責任是非常重大的。在事實上，新史學與社會史，社會史，教育史和政治法律史等等，尙與社會文化發生多少『廣義的』功利關係。止有站在背面的歷史語言學老板是『苦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顧頡剛先生說的真好：

『我們做歷史研究的人是不當豫先存着這種計算功利

的念頭的（指原文說的『孔子學說哪一部分是適用於今日的應當保存，哪一部分已經不適用了不妨丟掉』）我們的本分惟有把材料細細地分析，在分析之下判別他們的真實與虛偽；在分析之下尋出他們的互相關係和變遷的歷程。我們不管是非，不管善惡；單講然否。孔子的學說好，我們不提；倡孔子學的說壞，我們不排斥。我們只要處處透它一個本相。換句話說，我們要立于超然的地位，用客觀的態度來研究孔子，不要絲毫感情。至於，存善去惡，措諸實用，這是政治家和教育家的責任，不是我們研究史學的人的責任。這話初聽似乎奇怪，其實是很普通的事情。社會

的組織復雜了，自然應當分工。所以，研究力學的人不必兼製造機器，研究植物學的人也無須管理園藝，研究生理學的人更不能越職而替人治病』（孔子研究課旨趣書）

這就是歷史學家最誠實的供狀——自居于書獃子地位的供狀。我相信凡學習語言歷史學工作的人們應該服從這種真理，努力造耨這塊田地，否則，這人即反叛了正當的義務，反叛了科學的精神。我們的定生以爲何如呢？

四

仔細分析現在反對歷史語言學研究的可有三派：

第一派是『進步黨』。他們說現在中國太窮了，所關救紙

堆中的工作，一點也撐不住資本帝國主義的鐵蹄種種殘廢了。——國故是一條死路，我們應該換條自然科學的生路走走了。這的確是只把狹隘的功利主義放在眼中。然而他又說：『我們要希望一班有志做學問的青年人及早回頭想想，單學得一個方法是不夠的，最要緊的關頭是你用什麼材料……等你們在科學實驗室裏有了好成績，然後，拿出你們的餘力回來整理戰亂的國故，那時候，一拳打倒顧亭林，兩腳踢翻錢竹汀，有何難哉？胡適之的治學的方法與材料。』這的確是好好教訓我們的胡適之畢竟可愛，畢竟『進』了『步』。

我的對胡適之的態度不算前後矛盾的。我站在整個文化

(物質的,精神的)『分工合作』的原則的立場,我反對胡適之只好玩機器而抹煞人類精神的效用;我站在考古的立場,我要利用自然科學所給與的各種工具(方法)和成績(如歷史地質學,氣象學,人類學,生理學,統計學,等等)考古學家不藉賴科學家的工具和成績,一切工作(尤其是地下工作,言語學的工作和人種學的工作)是無法子進行的。

然而,却有一層問題我要求胡適之和一切反對歷史語言學者加以注意。就是:『各取所能』的問題。人的才性,各有偏重,不能強此從彼,強人從我。譬如我是不中意自然科學的,若有人下一道命令要我非進數理化班不可,結果就是白白糟蹋了

我的一生，使我個性不能發展。推至於各人各科亦然。我們無妨日日提倡勵獎科學救國，然而，我們不能於科學範圍以外的學術都加以摧殘打擊，應該給予相當發展的機會。社會的組織是如此繁複的，文化的分子是如此多方面的，其不合於潮流，不合於歷史者自然會天演淘汰的。安可以功利眼光，畸輕畸重？學術以有多方面之研究始有比較觀摩，始有競爭進步。所以希望以一種學科統一社會，包辦文化，這簡直是夢囈，而且勢所不可能。二、研究語言歷史學的人不一定本身就要兼自然科學家，如胡適之說的在試驗室裏有了好成績，然後以其餘力回頭來整理國故。科學的精神，可學而能；科學的成績，我們何嘗不可以

利用呢？

第二派人暫找不出適當的名詞來稱呼，所以『銜缺』他們也是提倡科學救國的，多可屬於『進步黨』。然而，他反對顧先生的疑古，謂這樣疑來疑去演成了千萬言，到底沒有結論，真的歷史，一點也建不出系統。這未免不顧事實了，太看輕學問了。大凡一種有價值的學術，從發生以至於成熟，決不會年紀最長，可以做到的。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是集古今中外的政治，社會，經濟，哲學，倫理之大成的。在中山先生以前有幾許政治家，做過部分分工的工作，有了相當的結論，到了中山先生手裡才拿一爐而冶之；到晚年，始完全成熟，獨創爲『救國主義』。又如新

文學運動是胡錢幾個人提倡的。然而沒有清代『從復古到解放』的今古文學運動轉入於世界文化之輸入的時期，和資本帝國主義開放閉關的急潮，這運動的『成功』至少要退後一百數十年。就算現在，新文學如天經地義了；然而，在韻文的詩歌方面，還不是正在試驗與稍稍進步當中嗎？這兩件不是明顯的事實嗎？

論到歷史攷證學的歷史，是很淺很淺的。從唐朝起，柳子厚做了一點『桐葉封弟辨』，宋朝北宋有司馬光，歐陽修，蘇軾，王安石等；南宋有鄭樵，程大昌，朱熹，葉適，洪邁，唐仲友，趙汝談，高似孫，晁公武，黃震等；明朝有宋濂，到了清代才有崔述的『考信』。

「桃糜恆的古今僞書攷」；袁枚以文人慧眼，也時時對於風詩論語，有所揭發；汪容甫（中）也敢疑老子是戰國時書。可是，這條疑古的線上，一方面聖道王功的觀念深中人心，離經叛道的話是要受天下正人君子唾罵的。別一方面，研究的材料只限於故紙（舊故紙也祇限于高文典冊）沒有擴充到地下。所以，大胆的假說，得不到證明，新的系統，即無從建設。

歷史攷證的學問，到顧頡剛先生手中活潑得多了。顯著的進步，就是能運用新的材料。如他用歌謠，故事，民間傳說等來溝通印證古史；用官廳檔案，地方志，家族志，一切社會事件之記載（如報紙，雜誌，報告，傳單，章程，紀念冊，人名錄）個人生活之紀

載（如日記，筆記，手札，訃聞，哀啓，壽文，輓詩，傳文，節存錄等）；
 籍中國漢族以外各民族之文籍，基督教會出版之書籍及譯本
 書；宗教及迷信書（如佛書，道書，善書，神道志，神像，符咒，卜筮書，
 星相書，堪輿書等）；民衆文學書（如小說，故事，戲本，彈詞，鼓詞，
 雜劇，雜曲，歌謠，寶卷，談諧文等）；舊藝術書（如醫書，樂譜，棋譜，
 法帖，畫譜，圖案，畫譜，遊戲書等）；教育書（如舊式兒童讀本，科
 學用書，歷年新式教科書，各學校講義，課藝，試卷，報單，文憑等）；
 古存簡牘（如商代甲骨，周秦漢竹木簡，漢魏以下石經，六朝以
 下寫本，宋元明初刻本書等）；著述稿本，實物之圖象（凡有
 記載性的圖畫照片，金石拓本，留聲片，影戲片，幻燈片及模型等

（等材料充實歷史的內容。顧先生這個計劃（可參考他的中大購求中國圖書計劃書）在中國歷史的研究上是值得大書特書的；雖然這些大部分還是紙上的材料，還沒有做到傅先生（孟真）說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可是，從並以『高文典冊』為研究對象的一條路上看來，能第一步做到顧先生的全個計劃，也就已經把中國史的研究帶到一條新生命的方向了。

自然，我們研究還要進一步去找東西的。換一句話說，我們是要由顧先生的購求中國圖書計劃到傅孟真先生的『借重考古學』和掘發地底地下材料如動植物化石，新舊石器時代的

事物，甲骨文等等直接材料之重要，此不必說。外人的考古叢籍，好些地方都比中國的精密的。『我們中國人多是不會解決史籍上的四裔問題的，丁謙君的諸史外國傳考證還不如沙萬君之譯外國傳；玉連之解大唐西域記，高幾耶之注馬哥半羅達記，米勒之叢讀回紇文書，這都不是中國人現在已經辦到的。凡中國所忽略如匈奴，鮮卑，突厥，回紇，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問題，在歐洲人如施洛外的注意』（傅先生的歷史語言研究工作之旨趣）因此，考中國的古，止在中國內部上天下地還不算，必須做到古今中外，地闊天空。

可是，這不過是我們工作計劃，計劃在計劃之中，一部牙旗

既着手（地面上的材料），一部分（掘發）尙未動手（甲鏹文，商周兵器等等，雖有出土，只是自然的慈惠；而且不多。有計劃的發掘，四五年前北平地壓調查所曾經在河南繩池縣仰韶村做過一點。後數年有清華大學李濟氏，和最近衛聚賢氏半靠人工，半靠天然，收拾了些新石器時代的事物。）這固有待於時局的安定，國家的幫助。——考古學在這種歷史淺薄，材料稀少，不能取精用宏的情形下，希望顧先生一把手將新史學的基石奠好，這要求過於急迫了。豈徒現在未能有什麼成效？新工作正待開始，收穫的時期，迢迢遠呢！

最後這一派就是『倒車派』。他們在表面上也是反對考

古提倡科學救國的，然而他的態度是非常反尋學的。他批評懷疑精神不是科學精神，又認為歷史有勸學善懲惡的作用，不必求真。這種精神于自然科學只有害無益，于史學的立場就是卑怯的，自殺的政策；詳細可觀現代青年何之的願頡剛先生的懷疑精神與拙作懷疑精神等等質何之先生，這裏再不論列了。

五

最後，關於我們的態度應該聲明幾句。諸位不要疑心我在上文對於考古學問怎樣說天花亂墜，怎樣在預備『書院』的『學究』（書獃子）宣傳聲氣，其實並不然的。自己承認自己是不出息的『學究』，是『書獃子』，則其看不起自己，提撕警覺

人們『股鏗不遠』、『前車已覆』其苦心孤詣亦可見一斑了。

真先生云：

『我們不做或者反對所謂普及那一行中的工作。近百年中，拉丁文和希臘文在歐洲一般教育中之退步，和他們在學問上之進步，恰恰成正比例。我們希望在中國也是如此。現在中國，希望製造一個新將來，取用材料自然最重要。的是歐美的物質文明；即物質以外的東西也應該取精神。于衰敗的外國。歷史學和語言學之發達，自然於教育上也有相當的關係。但這都不見得即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只要有十幾個書院的學究肯把他們的一生消耗到

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點綴國家之崇尚學術了。

——這一行的學術，這個反正沒有一般的用處，自然用不着去引誘別人也好這個，如果一旦引了，不特有時免不了致人於無用，且愛好主觀過於我們的人進來時，帶進了些烏烟瘴氣，又怎麼辦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趣旨）

青年們讀了這篇沈摯悲哀的誓言，大概不致再懷疑我們『賣花人說花香』吧！

一九二九，六，廿八草于中大南樓。

按：此文脫稿後先在廣州民國日報副刊現代青年發表；真正『寄定生北平』時，自己又把它增刪一次。——七月

七日。

定生按：願胡適之先生更進一步卽本集中願胡適之先生
勿懺悔一篇之舊題。

再寫在槃的文後

定生按：槃此文雖一面對我敷衍，好像也相信適之先生的有錯誤。然此次決不重要。他一面仍是在替適之先生張目。是則槃的說話，也正在我的所反對中。我之駁適之先生，槃至今仍看不出其主旨所在，這意思我又來罵適之先生已發揮透關。我這裏還欲說的話是，槃誤會我的最重要之點，是說我欲將紙上材料用科學方法『造出所謂自然的貨色來。』這真是侮辱我！一個人並不必像槃這樣聰明，——例如我——就儘可以明白紙上材料之決不是自然科學的對象。況我之駁適之先生之文，正是再五再六專致此意！我就是壓根兒承認

紙上材料永久是紙上材料，用不着「實驗室」。當然在物理「實驗室」的旁的方面，可以有——或多多可以幫助治紙上學問的地方，但仍是旁的物事，這責任並不是紙上材料所負！紙上材料所負有的責任，只是科學方法，而不是「實驗室」的實驗，因為紙上材料就不可能實驗。例如適之先生最近著的入聲考（新月一卷十一號）所用的例證，都是詩經的韻。試觀這能够起古人西渡太平洋，用美國的語音實驗室記載其吟咏之音浪，如劉復氏的工作然否？然則紙上材料既不可造出自然貨色，則奈之何往西洋「實驗室」有了好成績？之後，『回來整理我們的國故』就會好呢？治學不過是在方法。

自然科學用自然材料的方法是在實驗室，實驗室所以會有，是因為有自然材料的這種對象。假定世間的學問而無所謂自然材料時，實驗室即根本沒有話。故我對於適之先生的紙上材料而忽然拉攏實驗室等等，認為是有意作模稜語！是不應該的態度。因為適之先生之文，從此（拉攏實驗室）而處處在矛盾律的支配上，不成立。適之先生決不致如此糊塗。所以，樂的文中的『何氏問方法，不問材料』胡氏則謂方法要好，材料也要好簡直在胡鬧。『材料也要好』已決不是科學的說話。我不懂到底是什麼材料才叫『好』，也算就正同適之先生且『鼻孔出氣』說因為經過牛頓，萬利略，愛迪生……

治紙上材料的所謂『國學』時，我們是決不會去取水來當材料，不會取電來當材料，不會取鏽來當材料，不會取銃來當材料……這大概槃會相信吧！這何以故，以我們是治紙上材料的學問故，不是自然科學故！

科學方法用于自然界則成其為自然科學。科學方法而用于紙上材料，則成其為紙上科學（此四字是我杜撰，為便于說話。）同是用科學方法以對付材料而已，其材料因方法而產生之效果，則早在材料的個性上，適之先生好王充，即借用論衡之文言之，『猶鳥之別雌雄于卵壳中也』（初稟篇）。

故欲治所謂材料『好』的學問，則去而治自然科學則對，

並欲希冀不可能的紙上材料的像自然材料一樣變『好』則不成話。紙上材料終古不能變則不『好』此紙上材料之命也可奈何！整誣。我欲從紙上弄出自然科學的貨色，而又騙胡塗地自相信欲材料『好』何從『好』？叫紙上材料都變成『實驗室』的對象，叫紙上材料都變成電，鏗……，不是是整，整，你不會發燒吧，是不是已達到一百零四度以上節熱了？倘若是時，我怕是 typhoid fever，要當心呵！

中國人的聯想力真強！異樣！聽見『工人』二字，就會怕是共產黨，這並不奇；看見一本小說的封面有一片紅色，就早料想到這小說的作者也許是共產黨，而會發頭。我一說比較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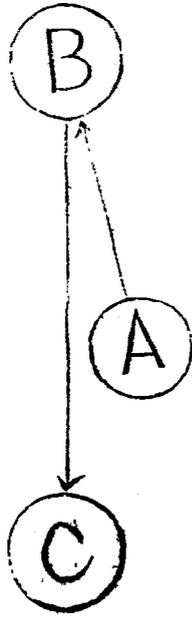
靜的話，槃就會疑我是欲爲『國學』撐門面。好好，畢竟胡適之先生吃多幾年鹽，看多幾年世情，一般人的心理看得透，所以寫得出那樣文字。因爲一般人不要真理，只要色。彩。色。彩就是東叫西隨便容易聯想在一塊，而認以爲真。這即是賣廣告的真理。適之先生只要在文中搬了『實驗室』及『餘力』，于是盡人皆會爲之曲折解釋，其矛盾者一轉彎則不矛盾矣，其不相涉者，一轉彎則相涉矣，此聯想之妙也。假若適之先生不透此一般人心理之關，則其文章決不敢如此寫！不敢在既反對治紙上材料的學，而又以與紙上材料無關的治自然科學所獨有的事的幌子來搖于仍舊所反對的紙上材料之上而

斷之爲才有成效！

這可以以下圖證明之。

假定以『實驗室』爲B，紙上材料爲C，科學方法爲A，依

適之先生之意，則其關係爲——



于是以入『實驗室』工作有成績觀之，是——



然實驗室的成績，終是實驗室的個性所有，初與我們的紙上材料無關。紙上材料依然是紙上材料所有，不是實驗室所有，于是科學方法之從實驗室回來也，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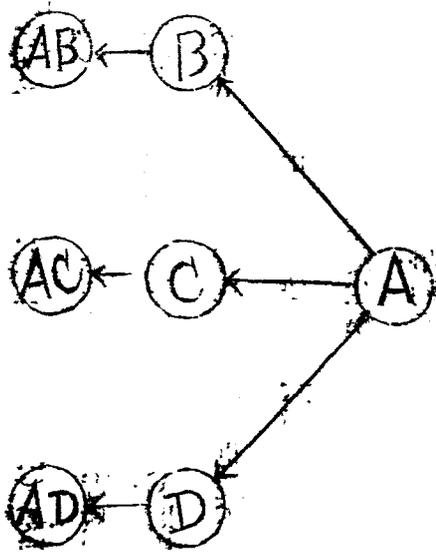


AB 是科學方法與實驗室所產生之兒子。而 A 自己若跑來同中國的紙上材料結合時爲——

倘若他們會竟相好起來，而又有胚胎了，則——



又爲他們的兒子矣。此時之A，雖是仍是在實驗室時之A，而決不相涉，因爲其所生的兒子只有A也。假若仍有第三種材料是D之謂的，而A又仍欲與之相好，那麼A仍可自由地到D處去，如——



所以如此看來，A 的同 B，同 C，同 D……生子，並不先至何處去討醋，就直去好了。



照適之先生的意思，譬如 A（科學方法）要同 C（中國紙上材料）發生戀愛時，是須先去同 B（實驗室）性交過的。這只是同 B 多生幾個小孩出來；若言于 C，則徒增醋意，並不會有益于 C 之胚珠；或者單從時髦講，也並不是 A 去同 B 相好後，會帶點 B 的什麼另第五種六種水來給 C 的。不會不會！夫既不會，則如之何這優生學家的適之先生，必欲叫 A 先同 B 性交才來搜 C 幹好事，而高叫曰：「夫然後 C 生子皆成天才矣」呢？此不是騙一般山內人，而也真不想一般人都是適之先生所騙的山內人也！

我寫得太倦了，我是沒有工夫再同樂相罵的。然而裏的話

也。算說得是很清楚了。不知樂還會聯想到另外什麼事不
會。

一九二九，七，十八，北平。

我說學問的材料只有自然的與非自然的，沒有死，只有
新的舊的；沒有死，只有是（材料）的非的，沒有好壞。俱
爾爾先尤利害，他說材料都是死的，方法才會活。我覺得他
的氣魄比我的見解好得多了。

（定生）

顧頡剛先生的懷疑精神

「何之」

我們中山大學曾經幾次的易名，也曾經過幾次的變態，第一次可算是革命化，大約在民十四、十五的時候；第二次是文藝化，大約在民十六的下春；第三次，就是國學化了，繼承在文藝化之後，還則現在，時間經過得最長久，聲浪也算是最高張，但變態，我却不敢下一個確切的斷語，有俟社會人士的公評。但是每變態，却都受幾個主持的人的轉移，這是我敢自信的，何以呢？當革命聲浪高張的時候，自然一半由于社會的需要革命，一半也受革命者指道的使然。迨北伐將近成功，革命空氣稍疏，那時魯迅先生來主文科，一時文科的學生，大興文藝，嗚呼之類，夫事不

奉，咸以爲中國的文藝盡在此矣。一旦周先生北去，接着顧先生等前來，于是語言歷史的研究，民俗的研究，應運而生，各種刊物按時而出，國學的聲浪，竟風靡一時了。我既不是國學的信條，又濫學于七十二子之列——文科大約七十人左右——自然有我的不得已之處。兩年來眼見各同學醉心國學和勇于疑古，不能不嘆顧先生的偉力，與衆士之善于師法啊！本來國學既變多人的睡罵，但疑古却仍舊一樣地滋長。我個人也曾有過一個時期的勇于疑古，初覺極有趣味，後來愈疑愈多，更碰更繁，越深真越不見底，真是夜長夢多，因原于日間的胡思亂想。然仍以爲學力不足，過度時間，事有必至，最後竟感覺到自己亦應具有可敬

疑的地方，（見後面）那麼古代的史蹟那得不『疑不斷，理還亂』呢？因此毅然撇開這種勾當，不敢再去弄弄這個玩兒了。

關於疑古這層，自然不能不推尊到顧先生身上，同時他也是人們所公認爲最勇於疑古的一員。我現在就拿顧先生來論論罷。顧先生一生治學的精神，可包括在『懷疑』兩個字；就因爲懷疑，所以處處有新的見地，和新的理論。他最初是疑夏禹沒有其人，近來似乎連孔子也覺有點不像樣（他開有孔子研究科），將來更不知伊于胡底。果因懷疑就能建設起新的史蹟出來，我們當然無置喙之地，如處處祇生懷疑無所建設，于史蹟弄成『迷花倚石』的樣子，予我們以諸多的歧路，于學術未見

得有功，對後學免不了無過。或者人有會忿怒地說：『你沒有眼睛和耳朵，看不見顧先生現在繼續努力的精神，一切建設就會跟着這兒來的哩！』這也是言之有理。但是我既不能候待乎將來，復不忍盲從於此刻，急心似病奈何！所以我寫這篇的主旨，完全效拋磚的巧計，那深藏在地下的玉，果真因此就給顧先生快點兒開採出來，那就好極的了！

話說得太離題了，現在再歸復到討論顧先生懷疑的精神。許多人認顧先生懷疑的精神，合科學的方法，我却不敢滿表贊同。何以故？顧先生懷疑的精神，我可以從他古史辨裡看得出來，就認為與科學方法有點不同。科學方法到底是怎麼樣？我固不

敢下一單簡的定義，但是由紋亂的現象，約成單簡的規律，是應的一種重要的工作。根據這點，再來證明顧先生的懷疑如何。古史辨裡顧先生找了無數的材料，翻了許多的古籍，我看了不覺不佩服他的勤勞和苦心。不過因要求過奢的心理，推使，懸揣懸就然生了出來，因為我看見他援據了無數的證據，預料定有斷然的結論在後頭，末了仍是『黑漆一團』。初以為先前的著作未必就是現在的學力然也；後來上上古史的課，又還讀到禹傳一類的講義，想必是參考的材料罷？不然前十年的懷疑，那得有此測仍未確定的哩！科學的方法，恐沒有這樣浮泛的罷？

我讀完古史辨之後，胆敢下這樣的批評：（一）顧先生搜集編

數材料的價值，遠不及丁文江君僅略加研究過一遍火成巖的變遷。(二)顧先生認禹沒有其人，是用懷疑的方法，丁君決意沒有夏禹治水的一回事，這才是真正的科學方法。或者有人以為懷疑，就是等於科學方法中的假設一樣。這也恐是勇于疑古的人，所持的成見，就因為假設不是如同不負責的懷疑一樣，以結果，也就大大的不同。譬如我在小學的時候做竹蜻蜓的玩具，知道兩斜對邊的厚薄不同，復借旋轉的勢，就可以飛騰于空中。此時我不懂是物理的性質，然以為能做較大的規模來，定可以乘坐而飛行了。惜此時無物理的智識，不能根據這假設的論理去求證據，不然飛機的創造，也不定是外人得先着啊！又如前

幾天我有位初由鄉下出來的問鄉，他自己一人跑到將軍前去
看馬戲，看見長木竿上攀住的人，既很可怪，而且木竿還豎在另
一人的身上，無論如何的攀援，也不會墮掉下來，那得不生詫異
呢？他回來便對人說：這是有符教的使然，或者是降着豐洞公主
(教國技的神)的神童，來做這種玩兒的。我向他解釋是重心
的關係；他却不懂得重心是什麼東西，那裡肯信，仍舊一樣地懷
疑符教和神童。前者是假設的起因，後者是懷疑的由來。懷疑固
不敢說是全無疑着的地方，但偏見與自擾的危險，總是萬分的
可怕。假設就不同了，牠不能逼出證據的時候，自己就根本推翻，
無須借賴他人來壓倒。此外還有很多的不同之點，待我述在下

面：

1. 假設可以統一意志：懷疑足以淆亂意想——當十六世紀以前，歐洲人都相信地球是方形的，迨哥白尼出倡天體運行論，人們都認為荒謬怪誕之說，尤其是一般神父，攻擊得最利害，遍找亞里斯德與聖經的證據，來做攻擊的利器，結果找不出半點出來，竟拿『莫須有』的罪，判為與聖經有衝突。但是哥白尼的假設，終可以堅固他的理論。人非木石，斷不致個個像神父一樣鹿豕似的蠢法。他以為假使地球非圓，當然是不易轉動，賴日月的自由運行，斷不能有循次與按時的步驟，而且會發生衝突。這樣一來，人們那得不信服呢？即冥頑不靈的神父，此時也禁若

寒蟬的不一聲了。懷疑豈能同日而語哩！三年前記得有人懷疑總理遺囑是偽造，全出于汪精衛個人的把戲。一時社會掀起了絕大的風潮，和聲的人也據了許多的疑點，好似像刺有個事的樣子。假如戴季陶汪精衛不在于當時，也就變成無頭的寒蟬了。故我說：假設可以統一意志，懷疑足似淆亂思想，就因為這的原故。

2. 假設是一切科的朝向與成績的發動機；懷疑是一切事物的廢壞和崩潰的壓榨機——我們知道牛頓發明地心吸力，是借賴于蘋果下墮的感觸。但物體下墮，本極常事，我們是司空見慣的；他却不同我們的一樣，一見了蘋果下墮，就發生何以一

定下墮的疑問，隨後就立下一個假如地沒有吸力，物體是向上升，不一定是下墮的假設。他根據了這個假設，就引證了許多證據出來，確定了地心吸力的定律。富蘭克林，看見晴天沒有電氣出現，即地上也無電觸人物事情發生，也下了假如陰陽兩電無須相因而成，或賴有一個引子，他是隨時可以發生的的一個假設。後來他遇下雨的時候，獨自跑到曠野的草場裏去放風箏，果然明瞭了電的性質。西洋科學的發達和種種的發明，大概都由假設導出來的罷！懷疑呢？即使懷疑到夏禹確實沒有此人，予人們也無多大的利益，僅僅廢壞了一部分的史蹟罷了，予國家社會有何用處，予學術文化有何裨益。故無論如何都比不上科學。

的假設所出來的事物的偉大啊！

3. 假設能從雜中求得概念與條理，予人們以非常的利便；懷疑徒增加人生種種繁複的現象，使人難于控制的——近年來西洋天方學家，視察到月球上的人，無論智識學力都比較我們地球上的人高超得多，想用電報去探探消息，這好似一件虛妙難能的事。但是他先立一個假設出來。就是，如果真空可以通過電流的時候，即使電碼不明，也可引上方的人有個注意，然後進行研究彼此達意的問題。並且現時正拚命去研究真空通過電流的方法。前幾年我曾見外國雜誌登載過一段美國無線電局接有地球上沒見過的電碼新聞，有人懷疑是月球上打來的，

也有多少可的信。這雖近似幻想，但是真空果能通過電流的時候，人們種有彼此可以互通消息的概念，而且他是一種有條理的研究，未必不可以實現。即使我們願意去做這種工作的時候，也可以跟着去做有系統的研究；斷不若懷疑似的一味發生問題出來，今天說夏禹沒有其人，明天又認孔子不甚像樣。我們既知東周以前是無史，儘可以不了了之，又何必苦苦地去懷疑呢。我們生當今日科學發達的時候，而且處于科學落後的國家，應一心一地的去追趕科學才是，那得有空去做『疑不斷還理亂』的工作，增加我們的煩惱，分減我們的志力呢？我們此刻應當除去一切無爲的意想，減少到最單簡的意念，才能應赴此刻科學

發達的世界啊！

4. 根據假設的理論可以逼出證據來；依照懷疑的態度現成的事實亦可以推翻——關前，在我前面的引證既經明白了，緣後，我却不得以無言。假如我立在顧先生的地位，懷疑古的精神，來懷疑我何之自己，也大有懷疑的可能。有一次我到傳書處去買週刊，看見圖書館週刊上題目下的作者，有「何之」的名字，我足足凝神了數十分鐘，回朔過去有無投稿，但始終想不到寫稿的一回事，這是一事。又有一次我到庶務處看見貼有「何之有掛號信」的條子，我進去領取的時候，發覺信是由汕頭交涉署來的，並且裏頭有三十塊大洋的匯票，信面又注明「何

之（即丘某）的字樣。我立刻將信璧回，說這是另一人的信。庶務員也很懷疑似的，不知其所以然也。這又是一事。還有一次是共黨暴動的時候，我僅被共黨拉到學生會的門前，就放了出來。後來橫嶽就有種種的傳說：最初是說：在區署裡由警察私放出來，得免危險；其次說：由一老人導引私逃，廿四人中僅一倖免者；最後說：是由神指示出路，得慶再生，這又是一事。就拿此三事來懷疑，就可證我不是中大的學生了。根據圖書館週刊，可知何之是圖書館的職員，按查註冊部的名簿，又確沒有我的名字（這是我的別字），依庶務那封掛號的信，足證何之是丘某的假名，照最後的傳說，我也多少的神性，再加以釋名，也可說是一

「胡適」釋字的假借，實際沒有其人。此時既有如此的懷疑可能，復經千百年的流變，真不知要變成怎樣的樣子！懷疑可以同科學的假設相提並論嗎？

最後討論到歷史是否要注重懷疑？這先要明白歷史的定義，歷史的定義是：

歷史者，敘述人類社會之總蹟，並闡發其因果之關係，演進之脈絡，以爲後來炯鑒者也。

歷史既注重在將來的炯鑒，那嗎，堯舜雖屬「烏有先生」，禪讓是思想的政治，也可爲後代的借鏡。即桀紂之流，也可作炯鑒將來的先例。我們又何苦去懷疑他們呢？故我以為如果爲史

能符合歷史的定義，有燭鑒將來的可能，無論黃帝也好，堯舜也好，禪讓也好，狩巡封禪也好，都不是大了一回。我們可以看見前人的著作，極多設取譬喻，借此醒世警人，這分明是偽造的事實，人們也不拘其真偽，一樣的作爲前車的共鑒，偽史又豈能例外？而偽造史蹟也不僅是古代才有，即近代的史實，又那能免去偽造的把戲。即近在目前的事，也人說各異，經過第二人的轉述又添加減少了許多，古史就可以想見的了。如果認懷疑爲治史的利器，那末非將全部的歷史推翻，另創設過懷疑的歷史出來不可。所以我認爲去做無爲的懷疑，不如多研究有爲的科學。不知大家以爲如何？

定生接：此文雖簡直是在胡鬧，而正幫助我們說話。何以故？以其處在反對懷疑精神的立點上而處處徹始徹終無意間証明懷疑之必要也！此許是這位署名「何之」者所不及料；而我們也就不必用他（「何之」）的俏皮態度告愾以「你不過看顧先生是舊勢力之勁敵而眼紅，或者更說不定你就是舊勢力一蚊之哼，就任你總不得不爲你的身家計，雖是蚊叫隔省，也得去盡其所哼」了。至哼中甚多似「亨」非「亨」的句子，那此時還不是有工夫教他的時候。

爲懷疑精神等實質何之

陳 榮

本刊相信學術的發展，端賴自由的討論。我們所應尊重的是真理，除此而外，不應有所偏袒。這不獨是本刊一種空洞的信仰，過去的事實，實可以作我們空佐証。讀者想必還能憶起我們批評國學運動的時候，曾發表許多替國學運動辯護的文字。所以本刊對於學術的態度是光明的自由的，自信在目前的出版界中是罕見的。今天我們發表蔡元培先生對於何之先生的質疑，也是這種信仰使然。何之先生的見解，當然有許多不健全的地方，所以蔡元培先生的糾正，確是一種要需。但何之先生祇見得顧頡剛先生的「不是」，蔡元培先生祇見得顧頡剛先生的「是」，都免不了有所蔽。其實懷疑精神確是求知方法之一種，自有相當的價值，未可厚非的。所以我們並不反對顧頡剛的懷疑

疑。我們不滿的乃是顧先生高揚科學方法的旗幟，而造不出一些科學的事實來。這層意思，說來話長，近日因腦力不佳，不能勞腦，稍緩當另草一文，以明科學方法急切不能有所成就的理由，而再申我們輸入科學之果的西洋文化的主張。

子恒

現代青年第二五〇期登載何之先生的一篇論文顧頡剛先生懷疑的精神，我讀完之後，不大明白，現在雜亂無章地寫一點意見出來，要求何之先生和有興趣的讀者加以指教。

何之先生寫這篇文字的動機，是想跟着胡適之提倡自然科學（？）的。這的確是好奇，我們不反對科學救國，自然應該十二分贊成何之先生的話。不過有許多地方提及科學的，何之先生

還沒有弄清楚，有幾處地方又有矛盾的理論和危險的趨勢，就如懷疑精神與科學態度和『疑不斷理還亂』乾脆不如不幹等等。因此我忍不住不說話了。

說顧先生紙上的辨偽成績之大，不及丁文江氏從地質上的研究料定夏禹治水之不可能，這我完全同意。故紙堆中所發現的材料，遠不及自然科學的收穫好而真實，此是天經地義，無待解釋。然而，兩種價值之大小差等是一事，而這種人從載籍上或客觀的事理上證明某種歷史是真實抑是假造這種工作的方法，態度，是否合于科學『精神』，又另是一事。我們不要把科學上的功利主義和科學精神，看得分不開了。一種科學方法，自

然科學者用以解釋及利用自然界的物體，可以獲得的是「功利」；用于形而上（並非指玄學）方面，則可以獲得的是真理，是真實（並非形而下）。廿世紀自然科學發達之結果，影響及于哲學，歷史，地理，心理，教育……各學問界者，其精神重分析，歸納，而一一本之于求真之觀念，合于客觀之律例（胡適之的哲學史大綱正是實驗主義的產物），故于學術能打破因襲，虛構，得突飛解放之進步。何先生反對懷疑精神合于科學，對於此點將作何等之解釋呢？

復次：何之先生用盡種種方法去攻擊懷疑精神，謂其如何不合科學，竟不知道懷疑精神之于科學，實有十分重要之關係。

不會懷疑（祇用直覺不用思考的）的人，永遠不會成爲科學家，此可斷言。一個人對於因襲傳說現狀有所不滿，或對於自然界現狀有不明白處，因而不安，因不安而求其解釋，然後，所謂真理，所謂定理，所謂確論，皆從分析，歸納之後產生出來了。是的，天下決沒有內心毫無問題的人，憑空會挪出什麼假設來的。何之先生說懷疑精神不合科學，這未免離題太遠了。

我最不能了解何之先生的地方就是他教人不要疑古。他說：

其

『依照懷疑的態度，現成的事實可以推翻……』

而他的三個例証，滑稽到了極點，而且從這個証例上，可以

推想到他的『黑漆一團』的不合科學的生活態度。就挪他的譬喻來說：中山大學已然發現兩個「何之」——一個是丘某假名的「何之」，一個是何德讓的「何之」。若是庶務部給三十塊洋錢時，不澈底調查清楚，乃末這筆款子，給誰好呢？若兩個「何之」各不相讓，竟然演起武劇來，這可就不妙了。何之先生那時還有資格說不必『懷疑』嗎？

說到歷史之效用問題，這本來不容易說。

『歷史者，敘述人類社會之總蹟，並闡發其因果之關係，演進之脈絡，以爲後來燭鑒者也。』

歷史的範圍本來沒有這樣狹窄。固然，如教育史，如經濟史，

政治史等等，研究的結果，是以『燭鑿』和開發爲重要部分的。然而，許多地方只是基于人類的智識慾和求真的動機爲出發點的，這其間毫無半分的功利意思雜着。就說實用，我們便可以相信傳說的說話，不用理智去考察考察史實嗎？你不提防假造歷史的危險嗎？

不錯，何之先生是不提防這些的，就曉得某種歷史是假造的，他也滿不介意的。何之先生因爲提倡科學之故，急得什麼似的，那里還有閒情閒緒去注意真僞問題？所以何之先生說：

歷史已注重在將來的燭鑿，那嗎，堯舜雖屬『烏有先生』，禪讓是『思想』（原文如此，符號我加的）的政治，也可

爲後代的借鏡。即桀紂之流，也可作燭鑒將來的先例。我們又何苦去懷疑他們呢？故我以為如果偽史能符合歷史的定義，有燭鑒將來的可能，無論黃帝也好，堯舜也好，都不是大了不得的一回事。

濫矣盛哉！滿口科學精神的何之先生，忽而頭腦麻模起來了！真假『都不是大了不得的一回事』了！提倡科學的人，忽然有非常反科學精神的態度，這還成話嗎？這還有資格提倡科學嗎？何之先生說：『懷疑徒增加人生種種繁複的現象，使人難于控制。』這又使我不知從何處說起。大概，何之先生已經討厭這種『顧頡剛式』的『繁複現象』，『使人難于控制』，所以『濫

烟迷到『可以統一意志』的科學的國度去了吧？

總之，顧頡剛一流人物，流弊無窮。他們揭穿黃帝堯舜的面目，使中國之人心世道受莫大之壞的影響，這已經經學衡派的先生們口誅筆伐過了。而現在，還有中山大學『七十二子』之流，跟着他瞎跑，難怪何之先生也義形于色，爲正當之罵了。

一九二九，五，七，中大。

我對於國學的見解

趙簡子

一 國學應改語言歷史學

何炳松先生在他的論所謂國學一文中，就國學本身應當推翻國學有四大理由：（一）來歷不明，（二）界限不盡，（三）違反現代科學的分析精神，及（四）以一團糟的態度對待本國的學術。其實章太炎早已見到此。他在他的國故論衡中曾說：國學應以語言歷史學來代替，免去種種流弊俗見及保守的成見。因為『名不正言不順』會產生對於國學的種種誤解的糾紛。

117

二 研究國學者的類別

新文化運動及新思想的介紹發生後，不久便有整理國故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有力的 Locomotive 便是胡適的在北大教哲學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講義——不久便印成書冊；繼之便是紅樓夢水滸西廂……的考證及什麼學案。再加以梁啓超歐遊回來，受法國學者之影響，遂更大聲疾呼古學 antiquates。於是飽滿的 Antiquarianism 便擴展為保存國粹了。整理國故與保存國粹便混而為一了。兩者的分別大概是這樣：

(1) 保存國粹——保守的，沉腐的，保守國粹猶如保存古物一樣；故於國家文化是無價值的。

(2) 整理國故——以西洋文化的真髓，以新精神，新認

譏來作一次古代文物思想的總批評，總結算，新估價還是有些進步的。

新文化運動及新思想之介紹之前或同時，必對於舊有的思想加以否定；而在起始否定，及新文化及新思想尙未能立足時，即打起整理國故的旗幟，必然要產生不良的分子；幼稚的追隨派，冒牌派，必然要興起一班學力有限，不得不據國學爲孤城的學者名人；必然給老儒宿學，與除國學外無能事者乘機而起的機會！結果這種運動的神髓只不過是要在死灰中尋出火燄來滿足他們的那滿迷好往古的情緒，或是想利用盲目的愛國心理實行他們倒行逆施的狂妄而已。最近有更陷於詭辯之痛

疾，如目前之於墨翟是印度人之爭論駁辯。在這樣的烏烟瘴氣的所謂國學中，國人對於國學自然有所嘖嘖或抨擊了。

三 國人對於國學的意見

上下古今談的作者稚暉氏是極力反對國故的。他曾屢次勸說胡適不必去走這種死路，他簡直要把一切書古文物拋入廁所裏。他的言論集多有這類的論調，恕我不在這裏舉例了。

十一二年間國人對於國故這一類東西也曾掀起反對或懷疑的大波瀾，當時上海的刊物如小說月報也曾討論過。

十三四年段執政時代，章士釗在他的甲寅週刊上揮筆時，雖是與胡適一班國故派稍異其趣，然而使國人對於國故更趨

於深一層的痲痺。

民國十八年春胡適在新月上發表了一篇治學的方法與材料後，國故、國學的叫嚷又突然掀起了。繼之便是何炳松與鄭振鐸的對國學的意見。隨後在文化落後的廣州，對於國學也相應地掀起了波瀾（按，廣州現代青年批評國學開始於十七年冬，此文說在小說月報之後，實誤。）這也是學術討論的好現象。

何炳松的文章指出國學應推翻的四大理由中，一個違反現代科學的分析精神是最重要的理由。鄭氏的文章題為且慢談國學，意旨概謂國人還沒有能力談國學，因為國人缺少談國學的修養。這個修養也就是一切學術的基礎——科學。

現代研究國學的人都多少缺乏科學的修養，因此使國學變爲一團糟和烏煙瘴氣，這是無容諱飾，而須養成科學的基礎爲研究國學的準備，也是彰彰然無須諱言的。不過一般人未免有些矯枉過正，似欲把語言歷史學（國學）完全地視爲自然科學，把研究自科學的方法及目的等視爲和研究語言歷史學完全一樣。這是很大的謬妄，這是把自然科學和語言歷史學視爲同一的東西，這是忽略了語言歷史學的本質！倘使這兩者之基本觀念不分清，不能澈底了解，則國學的舊有的烏煙瘴氣未除，而國學的新一團糟又加上了。——這是筆者所汲汲危慮而想努力申述解辯的。這一層是作者苦心執筆的唯一原因。所以

我當進於下面的小題目的研究（這也是質問何之先生的話）。

四 語言歷史學（國學）與自然科學

所謂語言歷史學是包涵語言文字學，歷史，文學，藝術，及在這些材料中可以探求政治思想史，經濟思想史，文化史及科學思想的片斷……牠的範圍是很廣博的，且受時間空間的限制。舉文學來說：文學發生最早的範疇便是詩歌，這是東西各國同樣的情形。可是中國發生最早的詩歌多是抒情詩，如詩經；而在西洋便不同，在詩歌上却先產生荷馬的 *Iliad* 及 *Odyssey* 的史詩。這是文藝上的空間不同。即就在中國如屈原宋玉輩的作品之特色顯示了南方的色采，當時因有南方文學之稱，這也

是文學上受空間的限制。文學上受時間的限制那更顯然的了。靡麗對偶的六朝文學到唐一變而爲所謂文以其道的韓柳之文。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一地方也可稱有一地方的文學。文學與其謂爲進步的，無寧是有機的 development。其他歷史學語言學也如此。

自然科學便不同了。牠絕對不受時空兩間的限制。牛頓的地心引力學說現在還能適用，中歷數世紀之久。不過直到今日才有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出而搖撼地心引力說。十九世紀 Verrier 及 Palle 以數學計算，測定別有天體存在於世，此即千八百四十六年海王星之發現。在歐洲能測之，在亞洲美洲測

之亦相同。物體除固體、液體及氣體外，復有所謂第四體、光體之稱。此即英人 Crookes 於真空管放電術研究之結果。在英國試驗之如此，在他處試驗之亦如此。千八百三十二年 Crookes 試驗之如此，今日廿世紀科學家試驗之亦如此。此自然科學不受時空兩間的限制。

又自然科學純爲客觀的研究，而所謂國學則不能全然與自然科學同，必具有主觀的色彩。康有爲以爲孔子擬古托制，這也許孔子利用人民的心理使然的。康氏這樣主觀的新創見是很有理由的。然而孔子後的許多儒學者便認爲真有堯舜文武之治呢。假使王莽早年而死，無篡漢之事發生，人將比之爲周公。

亦無不可。自然科學的研究是極其自由的，而且是真理只有一個，是由複雜的自然現象研究出一個單純的原理。所謂國學不是自然現象而是人類精神複雜狀態製成的廣博龐大的結晶，材料是廣博，而研究是極不自由。精神活動的狀態多而探求真理的路及結果亦多，不能以一而繩之。

上面在說明精神一般的學術——國學之本質，與自然科學不同，所以我們研究時，雖少不了取科學的方法，然而總不能忘去牠的本質，與自然科學不同。研究國學借用自然科學的方法是可能的，完全可能的；如自然科學的研究一樣而忘其本質，並把牠役於自然科學是不可以的，而且絕對不可以的。雖然地

質學的研究，古生物學的研究，人種學的研究，挖掘地層，尋求化石，比較生物之進化及人種之變遷等，在學術上可以少去許多故紙堆中的盤旋和鑽營。然而有的材料只要在文字上整理，用新方法來處理便足了；而且有的材料，雖用到地質學，人種學及人種學等的探求，而仍然用文字來研究的。歐洲的考古學以應用科學的探求及科學的幫助，雖已趨於完善之域，然而他們在文字整理的工作，書籍處理及考證的工作却比科學的工作還多。科學之研究固不可廢，然文字上及書籍上的工作不可不練習。且此種工作亦為科學研究的相當重要的基礎。

在今科學幼稚的中國學術，應當充分吸收科學，這是誰都

贊成，而研究國學的人尤不可不爲一般科學的修養以爲研究國學的基礎。但主張絕對應用科學去研究國學，並拋棄故紙書冊上的研究，這也是同樣錯誤的。現在故紙中還有可求的生命，書籍上還有可整理的材料，還沒有到竭涸和終結的狀態。這裏便涉及方法論的問題。材料是靜的，方法是動的，死的材料要運用活的方法才有生命。新的生命，如近代經濟學，德國便有靜的經濟及動的經濟之分。經濟的事實是不變的，而經濟的組織是可變的，只是由具有思想自由的人善爲變動而已。文藝史上有古典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之分，而無產階級派的新藝術。家便分爲貴族的文學，資產階級的文學，勞動文學或無產階級

的文學。文學的事實是不變的，不過觀者所用觀照的方法不同，而結果自然不同，這是彰彰然的。譬如沒有好久以前，東方雜誌上有一篇周易的時代背景及精神生產，這篇研究方法絕與古代所用的方法不同，完全以站在唯物史觀上用時代與社會性去觀照這部作品而研究的，所以結果是很新穎的，動聽的，並且較以往的研究具有新鮮的印象。

所以我最後說，研究國學應當要有科學的修養，然而文字的工作，書籍的整理仍為重要，不可偏廢；並且認為須要科學的修養的人便完全忽略文字的工作及書籍的整理也是不健全的論調，而且是謬妄的。因此研究要注重活的方法，這是很緊要

的。

五 所謂顧頡剛先生的懷疑精神及其他

我現在要討論的是（一）顧頡剛先生的懷疑究竟是否反科學的，（二）懷疑的科學。

顧先生在他的古史辨的編首上引用羅丹美術的序文。這是在顧先生他自己是很有意義的，尤其在我讀來更覺他引用那個序文之不得已和苦心。短短的序文是值得轉錄來的：

『要深澈猛烈的真實。你自己想得到的話，永遠不要躊躇不說，即使你覺得違抗了世人公認的思想的時候。起初別人亦許不能了解你，但是你的孤寂決不會長久。你的同志不久就會

前來找你，因爲一個人的真理就是大家的真理。」

這個引用的序文真替顧先生預言了肯定否定兩方面的思想。Conservative的學衡派便猛烈地攻擊而完全否定了他的懷疑精神，因爲他是『違抗了世人公認的思想』本來顧先生揭穿黃帝堯舜的面目，使日常生活的傳統的思想之體系搗動，自然一班 Philistines 便恐慌了，而以爲他在夢中發瘋語了。中大民俗發刊辭，曾有推翻聖賢文化，建設民衆文化之口號，顧先生又在嶺南大學講演聖賢文化與民衆文化，這是以表示顧先生懷疑中國古代文化問題，而想在學術上月走入到民衆文化的新路徑。這種打破幾千年的傳統思想，逃脫於士大夫

及一般上層階級的文化而尋出新的學術領域，這不能不算顧先生懷疑之可取。要說他是非科學的，這是有些得罪吧，或未免信口雌黃之無聊吧。

顧先生卒不是傳統保守的思想的人，他是處處唯謹唯慎的。他卒不會如何之先生口裏吶喚着科學的精神，而心裏不知不覺走入反科學之途。去年冬，中大語言歷史學研究所曾有採取科學的研究語言歷史學的宣告。這也可證明顧先生是卒不會如何之的善於懷疑。他的懷疑是從極纖細的心理出發的，從找到許多材料證據來立論的，因此使他不得不懷疑。他的工作並沒有不合科學的：不過他却沒有用地質學，人種學，古生物學

來作純粹的研究而有所貢獻。這一層我們在良心上及事實上總不能苛責於顧先生，因為顧先生在北大讀書時，尙沒有用科學來幫助國學的提倡，而且中國的學術在故紙中尙有無數須整理的工作，所以顧先生沒有吸足科學的修養。這是中國學術幼稚的影響。又顧先生見有不必待科學的修養而須在文字作一番急切的工作，所以古史辨便產生而打破中國傳統的古代歷史及古代思想。總之，顧先生不能具有純科學基礎爲國學的研究，這完全是時代的關係。一個學者無論如何偉大，總不能不受時代的影響。這是稍認識社會勢力的學者總該首肯的。最近的顧先生覺得研究國學應當引用科學，也可證明他不但是精

勤不懈的學者。而且他是自由精神的探求真理的人，何嘗是反科學的，在學術上及工的態度上。

最後便說懷疑與科學。科學是一種真理，但是真理如蕭卜納所說是無一定的永存不變的。這是因為真理有時受時間空間之影響的結果。然而人對於真理日日懷疑，處處懷疑，真理乃趨於完善完美之域，而科學才能從假說進於原理。牛頓沒有懷疑蘋果落地便不能產生地心引力學說；愛因斯坦不懷疑龜心引力學說，便不能發明相對論。世間無一定的真理及無不變的原則，所謂真理及原則不過在時空兩間有相當的或部分的存在而已。這因為人類智識日益發達，思考日益進步，時時處處用

懷疑的精神觀視一切，所以懷疑與真理的推進，是應用到 *Dialectic Method*。懷疑是科學的出發點。顧先生懷疑黃帝堯舜孔子在科學上是無不可的。不過懷疑起點到最後變成合於科學的結論之過程，是極可注意的。這一層何之先生却沒有說及，而只說懷疑徒變成理還亂之 *chaos*。這種論證却不是什麼科學與否的問題，却是 *common sense* 的問題了。筆者處於沒奈何的地方，對於何之先生的歷史的定義等等還有有饒舌，這是有些無可如何的悲哀的啊！

六 何之先生的歷史定義等等

何之先生下歷史的定義爲『歷史者，敘述人類社會之總

蹟，並闡發其因果之關係，演進之脈絡，以爲後來燭鑿者也。」

何之先生這個歷史定義有些使我氣餒。然而把牠抄下來，也是筆者的莫奈何而已。這種陳舊的定義及有許多語病，在滿口科學的何之先生總應當修改成更完美的（科學的）的定義——這或者是何之先怕『理還亂』所以就束手待斃了吧。舊的歷史學總愛掛起『闡發其因果之關係，演進之脈絡』這就不是科學的歷史學了，這已是在歷史上加以人爲的附隸物了。歷史含有兩種意義：（一）人類過去的活動，（二）人類過去活動的記載。所以歷史研究的對像自然是人類過去的活動。活動的方面概包括五種：（一）經濟方面，（二）政治方面，（

(三) 教育方面，(四) 藝術方面，(五) 宗教方面。『闡明其因果之關係，演進之脈絡』的語句，在我們把研究歷史的述語與研究自然科學及研究言語歷史與研究社會科學之不同弄清楚就知道這是反科學的。

七 歷史的研究與自然科學的研究

歷史注意事實之實質上的各種異點，而自然科學在各種實質上求牠們相同的地方；歷史將各事實的一方邊作普通的各個研究，所以沒有一定的範圍，而自然科學專注意在許多實質中某一種原質，所以非常單純，而研究的範圍由複雜而簡單。歷史又須受時間空間的限制，而這種限制在自然科學是沒有

的。自然科學研究的步驟是觀察與實驗，然而在歷史上這種觀察與實驗是不可能的。所以歷史是純粹主觀的學問，而自然科學便是純粹的客觀的學問。

八 歷史研究與社會科學研究

歷史的目的在紀述人類活動的渾淪，而社會科學在未人類活動的通則；歷史在過去生活中求不同，而社會科學在過去生活中求相同。所以研究歷史之結果是人類活動之渾淪，而研究社會科學之結果是人類活動中之定律。

何之先生還執拗於「闡明其因果的關係，演進的脈絡……」
「學術日益複雜，研究日益精深纖細，這不就是合於科學

的麼？不是，何之先生？

寫到此，我的手臂酸痛極了，我就在此帶住了吧。我對於科學並不是內行，對於國學又是門外漢，完全鑒於我的直覺寫成這篇文章。

十八，五，十三，夜中。

附記：此文是以現代青年發表的刊頁爲底稿，字有的模糊，有的錯漏，又顧不敢粗率改校——因爲就沒有可校體依據，所以我頗担心許會仍有錯漏的字形，雖則很明顯的錯漏我是大胆自爲校改幾處的。我希望作者諒我。（編者）

說幾句

何子恒

執字房的工友告訴我，篇幅不多，恰巧在我也精神不好，所以就隨便說兩句，來填補趙君的空白。

國學的研究須築在現代科學的基礎上，這是大家公認的一個結論。若照趙先生的說法，國學就是語言歷史學，則所謂國學者更與社會科學脗合了。

但事實上研究國學的人，往往對於現代的科學是忽視的。不僅對於自然科學忽視，即對於社會科學也覺得與已沒有關係。正如胡適之說：『日日與古學爲鄰，漸漸變成與鬼鄰了』（原文已忘大約如此）要想抽一些時間精力出來培養科學的基

礎，也就成爲一種心餘力不逮的空想，結果不獨大批以國學爲對象的青年，終日銷磨其精神於故紙堆中，無餘力來顧問現代的科學，即大名鼎鼎的國學大家，也何嘗具備了研治國學的資格——現代科學的修養？所以現在的國學運動也就勢必至於成爲一種離開科學的隨便的研究了。而科學方法也遂跟着成爲一個空洞的招牌。

所以我們的批評國學運動，並不是反對學術的研究。我們不像吳老頭子那樣，一方主張將中國書丟在茅廁裡，他方還要斥純粹科學的研究爲洋八股。我們的主張，是要研究現代的學術，從現代的學術裡擴大我們的學術上的視野，充足我們學術

上的培養，然後來建立我們中國的歷史，建立我們的社會制度，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史；建立我們的發明史，技術史，科學史，思想史，語言史，法律史以及其他的特殊史，更及其他的所謂國學。

但爲什麼在建立我們中國的種種歷史之前需要研究現代的學術呢？這就因爲這些特殊史的建立，不是乾脆一個懷疑或高挂一個科學方法所能濟事的。這是迷信高懸科學方法的胡適之與顧頡剛的人們所應有的覺悟。科學方法，在歐洲用了四五百年才有今日的成績。我們現在就算急起直追關了大門用科學方法，最好的成績，也不過將歐洲四五百年的學術史復演一遍，決不能將四五百年的時間縮成四五十年。所以一個

乾脆空洞的科學方法決不是國學研究的護身符。國學研究的真正的護身符，乃是四五百年前的年科學方法所造的結果——就是西洋的學術。

我們唯一的捷徑是吸收。譬如西洋已經發明了電燈，我們便無須慘淡經營的再去發明了，祇須拿來模仿就行了。學術的造就，也是一樣。若他人在各科學上已經有了相當的成績，我們便應該吸收過來，不必自己去盲衝瞎撞的。這是社會學的研究所指示我們的發展文化的唯一途徑。

所以國學運動之前，還須大大地做一種西洋文化輸入運動。我聽說中大圖書館購買故紙堆的錢，佔到購書經費十分之

六。照此看來，國學的研究已佔了科學研究（自然科學一起在內）的上風了。試問怎能使國學運動成爲一個健全而有成果的運動？

我們的結語是：要使國學運動健全，必先努力獎勵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研究；必先經濟我們的金錢時間精力，不使浪擲於超乎時代的早熟的國學運動方面。

我對於趙君的文章有許多不能苟同的地方，但限於篇幅，不能多說，他日有機會再說罷。

「新」「舊」材料與治學方法問題

定生

我用「新」「舊」二字來代替「生」「死」，因為我不承認學問的材料會像胡適之先生所說般的。「生死」是對於材料的評價，根本上便不合理論。我們對於學問的材料，只有述說，不能有評價而「新舊」即是只對於學問材料的述說。學問的生死不關於材料，學問的生死是繫於方法。這話怎樣講？材料若有生死，則方法的重要地位便根本推翻。材料「生」了，初不必更問方法；材料死了，則方法也不能有所幫助。故胡適之一面承認科學的方法是生路，一面又謂「國學」的材料終久是死的，予

是不得不犯了邏輯的『矛盾律』而將全稱肯定命題和特稱否定命題並存于文章結論裏。這可見以材料爲學問『生死』的評價，在理論上根本是不成立。（參看新月一卷九號胡文）

還且，在事實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出材料並沒有所謂生死。哥白尼，葛利略，牛頓……等出生以前，所謂生的材料的他們所研究的對象的那些自然界的事物，不是都並不見得爲生的材料麼？（成所謂生的材料，怕不就是因爲有牛頓等一輩人的意外成績了而跟著起來的一九二什麼年的中國的讚頌）而王陽明的所謂『格』了『七天』的『竹子』，只是得個『勞思成疾』遂相與歎……，『難道不是以具體的自然界的實物爲

研究的對象，河南殷墟挖出來的獸骨龜甲，章炳麟劉師培等並不能夠從而于學問有所貢獻——他們不相信地下材料。在骨董客這些古物，『死』自不消說；學者如章氏劉氏也復柯書畫『生』？但一到孫詒讓的手裏，史學上且有新的解釋（胡適之治學的方法與材料一文引的關於地下材料的例，多可參看，現在不舉）。

於是，我們很明白，生死不是跟材料說的，是跟方法說的，不是材料有生死，是方法有生死。學問的對象——即材料——是永久同一的，只看你所用的方法怎樣。你胡思亂想，沒有系統，沒有組織，可見你沒嘗用著對的好的方法，那末，什麼材料都不嘗。

生。你有好的對的方法，你精密下手，那末，什麼材料都不會死。朱晦庵的『格』物之學之所以不成功，便是因為沒有好的對的方法，要不然，

『今登高山而望，羣山皆波浪之狀……』

『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語類）』

等不都是自然的事象麼？只爲他只憑直覺的見解，故僅可得

『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甚麼事凝了。』

『此石即舊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變而爲高，柔

者即變而爲剛。』

一類的想像，而不能終成學問。

材料既沒有生死，新舊的話怎樣講呢？這也很簡單，並沒深奧的意思。近人治學，常有待於地下材料的傾向。自『甲骨』文在『國學』上有了新發展之後，各地的從事發掘者，更加高興。這些未來或來著的地下材料，我們當然叫牠『新』的；至出土之甲骨文也即是新材料。『新』的材料，意思是說牠於我們的研究，會給予以新的激刺之謂，故當然也不限於所謂實物的或是紙上的文字。

未來的材料，現在無從說，單說甲骨文。甲骨文出土雖已三十餘年，但對於牠，我說，並不能便謂已到登峯造極的地步。換句說，甲骨依然是很新的材料。字形方面的工夫，許會成績較好，然

王靜安也是取孫詒讓所成就的功績而推演之，初不能于孫氏更進一步。文法上，也是這樣，都是孫氏早構個輪廓了，繼起的人，好像很少『青出于藍』。近人胡光燐作一本甲骨文例，頗有些新的見解，但也仍未能便建起甲骨文字的深固地位。

於甲骨文自身研究的成績，我們所知，既是未能達到最成效的地步，那自然說不上能于學術上有很大的貢獻。王靜安用他來證古史，在他的古史新證一文中，我便覺得很失望。不過也難怪。王氏仍是站在孫詒讓的立場上使用材料的。甲骨文的成績，至王靜安而震動一時了，王氏如此，則其總成績可知。然則甲骨這部新材料，是仍須研究的材料。

不但甲骨文如此，我以為被胡適之先生認為死材料的紙上文，仍不盡是『舊』材料。

『舊』材料，好像是指一般過去的材料而言。既經研究過，便好像更不能從而得到『新』的激刺。但，現有的許多紙上文，果然都是『舊』的嗎？果然其中沒有『新』的了嗎？這仍是一個研究的問題，我想。

二

我們現在來談古代許多待整理的學術的問題。于古代學術的整理，果然都有過工作了麼？我知道這句話問出去，答案最少是承認工作過不少的。其實，嚴格說起來，有許多許多前人

的工作，我們不能承認其爲工作過的。有許多前人雖工作過了，到我們仍是需要工作的。我們所不承認已工作過的材料，這固然在我們是『新』材料；即前人明是工作過了的，到我們仍需要工作時，便也仍是『新』材料。例如左傳這部書，在康有爲的新學僞經考中，是很有胆識的研究過，而給予近代人以劇轉的觀念的，但瑞典的中國學者 Karlgren 的 The Authenticity and the Nature of the Tsochan（左傳真僞考，胡適之節譯，載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第一卷第一期，又單行本陸侃如譯）一書，便全和康氏不同。它的研究方向是另爲一種的。我們看它的研究，顯然可以看出左傳這部書和其它有關係

的書如書經，詩經，國語，史記，論語，孟子……等，在屈氏是『新』的。經今古文學自閻百詩等至康有爲，是將古文打倒了，今文學已大放光彩。但至顧頡剛先生而知道今文仍是偶像，則是康有爲的未完的工作上，其材料在今日仍是『新』的。故我以為在今日的古代學術中，新材料仍是很多，只要你會運用對的方法。是的話總是歸根到『方法』問題上來的。我國三百年的治學，我在顧胡適之先生勿懺悔文中，嘗謂其並不能算是真的用科學方法。適之先生稱許他們為和葛利略，牛頓等一樣，是因為他們能夠用下面的方法：

1 用歸納法以求通則。

2 用演澤法以用通則。

胡先生於讚美他們研究古音韻外，同時很推崇王引之的經傳釋詞。音均我是外行的。論經傳釋詞我也讀過。我覺得它的用歸納法很粗造，往往不合論理，而成爲詭辯。故比較嚴格些，實在不能便認王引之等爲真正的使用科學方法。王引之等是過去的了，時至今日，『科學方法』的貨色，已算是時髦極了，但是，會不會是真貨呢？我們到是不好不研究一下。

『大胆的假設，小細的求證。』

這是很清楚的，于使用科學方法應具有的重要態度。但是，當這二十世紀，科學的世紀，大家仍都往往只將牠記得一學，只

會『大胆假設』而不肯『小心求證』。其所得的學問成績，於是便非像『如數家珍』般的衛聚賢的古史研究的隨便斷判，便是像胡懷琛的墨翟爲印度人辨的想入非非。信如這樣的幹下去，『懷疑』精神固然也爲國人的異樣光榮，且傳統思想決不足打倒，怎奈『懷疑』並不這樣容易講何！故我以為，要是科學方法而不能夠莊嚴，則現有的什麼學術的紙上材料，仍永久是新的。仍永久要待研究，整理。

三

我近來常覺得整理各種事實或理論，在論理上考慮周密之後，得加以統計學的排列處理，才能使所得的結論更爲精確。

在治有歷史性質的學問，像古代學術，是更常有機數 (Probability) 關係的。這種機數關係，有賴于統計學，才容易說明。

近人以統計學來應用在古史上的，有衛聚賢的古史研究。這種新的方向，我是十二分重視的。衛氏的用統計學，並不能充分的表現這個方法的意義。他一方面用統計法，一方却不能用合邏輯的辯證。我們要知道，理論而不嘗經過邏輯的洗練，是不能用的（校勘學 Textual Criticism 是另一事）。譬如取許多事理來統計，來排列，這些事物如不是邏輯地整理過，根本使無用於找尋真知的價值。像衛氏要證春秋經的數目中有『又』字（與『有』通）的用法是時代的，他用統計來歸納通例，所

又如，他要證明春秋是孔子所作，而想從三傳的異文來生情，將同音同義字，依春秋異文箋所考定列爲統計表而比較三家的關係。這樣比較，祇能證明「穀梁的春秋用魯方言改餉比較公羊的春秋用齊的方言爲少，」並不能便可以證明是「孔子研究的歷史標準本」給子夏帶到西河去，公羊又從子夏抄去，然後「用齊國的方言，改了二百多條，」又因爲「穀梁約前輩是趙人（據水經注的「博陵穀梁城」而下的斷案）或魯人，因魯人多從孔子遊，」而斷定他是懂魯話，所以改的少，孔子的學生多不限魯人，則孔子要講學必先會說普通官話，才使學生不隔膜，這編計劃也是孔子講過的，而唯一的斷案，便可從論

語「名不正則言不順……」一段來，他說：「即文字沒改良則語言不統一」云云。這樣的邏輯，真是太侮辱科學方法了。邏輯是在嚴謹事理周密的相互關係，而統計學則在鞏固和擴大其可真確機數，使用如此，委實意義全失！

衛氏的論證最壞，幾乎全部古史研究沒有存過，復旦當時論證，除幾處統計表。我這文不是專為批評衛書，我是要指出中國近人新傾向的治學的毛病的。但我現在不妨再舉衛氏的一些謬誤來。（詳論當俟專篇）

衛氏謂左傳是子夏做的。他當然要推翻左傳為左丘做的的傳說。子是他說：

「論語載有孔子自說『左丘明耻之，丘亦恥之』的話，是孔子見到左丘明的。又按，『孫子臙脚』叫做『孫臙』與『左丘失明』叫做『左丘明』（漢書司馬遷傳『左丘明無目』）當是一例；是孔子曾見到左丘失明，叫他『左丘明』了。按『左丘明……成左氏春秋』與『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是左丘明未失明前有左傳，失明以後著國語的傳，國語有『趙襄子』襄子卒在孔子卒後五十四年，那麼，孔子安能見到他死後五十四年的人失明，呼他爲『左丘明』？……是以說『年表』所載『左丘明……成左氏春秋』是太史公所誤。」

我真想不到衛氏這樣做論證的人會使用統計學于「國學」！這樣的論證，不是要叫人看了絕倒差不多，這百幾十個字的討論，沒有一句不是好笑的。

我們看衛氏這樣論證，於是我們便不會驚怪胡懷琛的墨翟爲印度人辨。胡懷琛這樣快瘋了的妄人，是除了像汪靜之（？）考定他也是印度人外，實在沒有同他「莊語」的可罷。但近日衛氏寫信給中大史週編輯余永梁，云他看見胡氏辨墨翟之文，他也要做一文辨老聃是釋迦牟尼了。以我所見于他們的著作所用的方法，我逆料必沒有好的結果。他大概想要與胡氏爲二絕吧！

整理過去的學術，並不是些什麼瑣雜般的編纂。在「漢書」編纂時代，他們那班漢學家，是認真做下去的，只顧着他們沒有很大的計劃，不能夠很有系統地工作，不能夠算大體的假說；所以他們仍不能算真的科學方法，故仍不能算真的科學。現在呢，像前所舉的衛氏胡氏等，則又有工具而不規，衛氏其而不會用，花樣則新矣，胆子則大矣，懷疑則够矣，去論學術的實質無補焉！

目前之計，整理教學，我以為，仍正從科學方法的根據上說，整理過去的學術，和不整理過去的學術。要整理過去的學術，給整理過去的學術。

其學問的深遠去整理，畢竟仍是在於其學問的深遠。於是，其學問的深遠，投成見，冷靜，沉潛，精氣，持續的做去，才有希望。

五

我稱許許會太抽象些。雖然，我沒有法使牠們具體化，因為我自覺並不是個學問的人，我只能憑我的聰明去觀察。我還是稱許是去問顧頡剛先生好。

顧剛先生在還兩年來，差不多是不被笑罵，以我看來，他是在學問的深處，學問的許會。倘若他所稱度的不實錯時，他必能發現許會之精，作多方面的分析，然後從容類去，決定其要點。

的路——即分工，讓大家性所近去努力。這是基礎的計劃。

顧剛先生這兩年來在中山大學只是編講義。在皮相的旁觀者，說他只會找材料，編講義，並沒有做什麼研究。這些話外行得很可以。你說他只找材料，編講義，其實他正應該不它隨便做什麼研究。他這兩年來，自己標點過的所排列的材料，是足有二百萬言。雖二百萬言並不算很多，但這種態度甚可注意。人家所不以爲然的「只在編講義」，他自家還常常自歎生活太忙，時間不夠，編得太少。他預備所編的講義，現在還沒有編完呢！

編講義，一般人以爲是很平常的事，尤其謂是只在找材料。其實，方法不同，則毫釐千里。試問世上編講義者，有過編二百萬

言的材料不若二百萬言更進而三百四百以至千萬，寧不使人目眩口呆，不知所以！

但是，要是你明白他是在作系統的排比分類時，你當可因此而作深長思！

朋友，請你平平心，你不要以為好隨便動感情，謾罵學問。

一九二九，一廿二，在中山大學。

這文我寫給現代青年的時候，就論及傅孟真先生同顧剛先生的交去好久，編輯雖給我信說要發表，但總不發表，默氣的我，當然寫信去質問他。他不答，仍不發表。我忍不了，走去問他。他道歉，扭扭捏捏一回之後，才表示不願意發表。

介紹顏剛先生的治學。我真覺得好笑。我想，何不就爽快說呢，幹嗎這樣充姑娘？爲幾個錢稿費，我答應他的刪去未蒙的要求。但他仍不忠實，在發表時，我發見關於提及孟真先生的一小段也給刪了。後來潮陽期刊要我做文，我若求離免，無效，乃將此稿塞責，而補上關於顏剛先生一段。至關於孟真先生的，因爲給現代青年散失，沒有心緒再寫了。此次我到北平，又覺得對於這文又有許多不滿，于是在這會子編入的碟，修改不少；而中間駁胡懷琛的全行刪去。

八廿二編後附記。

目書版出部理經版出社樸

古史辨第一冊 (顧頡剛著)
 甲種實價二元四角
 乙種實價一元八角
 四版，丙種實價一元二角
 子略(高似孫著)實價三角五分
 諸子辨 三版，(宋濂著)實價二角五分
 三訂國學用書撰要 (李笠著)實價五角
 歐洲哲學史上卷 (徐炳昶譯)實價一元
 社會學上之文化論 (孫本文著)實價六角
 文化與政治 (許仕廉著)實價一元二角
 國內幾個社會問題的討論 (許仕廉著)實價一元二角
 普通生物學 (經利彬著)實價一元二角
 陶厂夢憶(張岱著)實價五角
 聊齋白話韻文 清蒲松齡著 實價五角

歧路燈第一冊 (李綠園著) 實價八角
 四六叢話敘論 (孫梅著) 實價二角五分
 論文雜記 (劉師培著) 實價二角
 人間詞話(三版，王國維著) 實價二角
 張玉田 (馮沅君編) 實價二角
 中國文學概論 (陳彬龢譯) 實價二角五分
 玉君 (四版，楊振聲著) 實價五角
 佛西論劇 (熊佛西著) 實價五角五分
 水經注寫景文鈔(范文瀾著) 實價五角五分
 甲種實價五角
 乙種實價三角五分

注意：欲得本社詳細書目及景山書社書目者，請賜函示知地址，當即奉寄。

民國十八年八月初版（一千册）

關於胡適之與顧頡剛



甲種 洋宣紙 實價四角
乙種 瑞典紙 實價三角

著者 定 生

出版者 棧 社

印刷者 北平南池子飛龍橋 京書局

總發行者 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 棧社出版經理部

總代售處 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 景山書社

分售處 北平及各省各大書坊

佛 M-119
說 n
104

